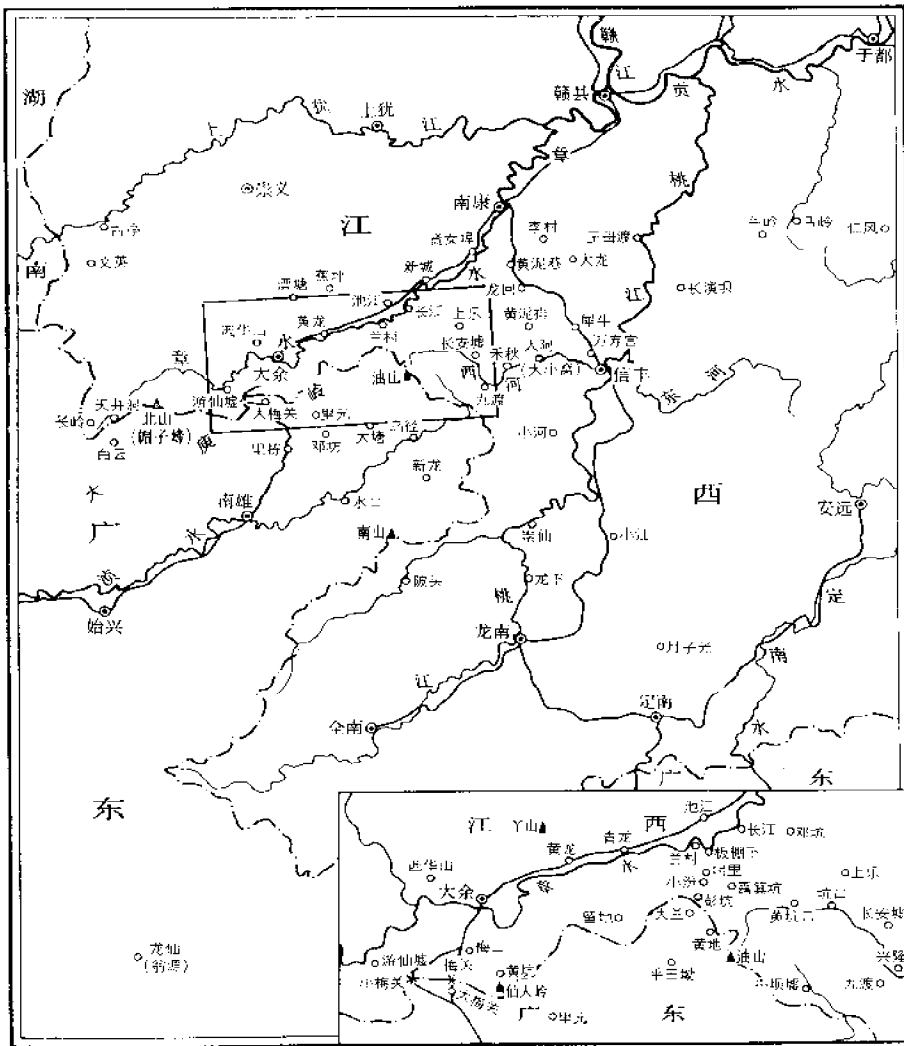


赣粤边形势图





谭震林 摄于一九三七年春

序 言

陈丕显同志写了这本关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书。他要我为这本书说几句话，当作序言。我说什么呢？要说的话是很多的，可是事隔这多年，我的记忆毕竟

不如从前了。

但是我兴味浓厚地读了丕显同志这部书。这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它离开今天都快有半个世纪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事实上是一部战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写得精明扼要，而又很完整；生动活泼之中，却十分严肃；它本身就有它的历史意义，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九三四年的秋十月。

当时蒋介石结集大量兵力，亲自指挥，并由纳粹德国将领任顾问，以堡垒政策逐步地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逼。而我党领导人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结果是我红军主力的各个部分都无法发展、扩大，也不能转入抗日战争，只能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另行北上抗日。于是，在这种条件下，留下来的南方八省的红军，面对着强大的敌人，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夏天的“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个历史新阶段才

出现。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这部书用史笔写出了赣南三年战史的来龙去脉，它的发展的全过程，它的重要侧面和事件，写出了历史的具体情况，还形象地再现了许多普通的战士以及英雄人物，他们出入于崇山峻岭之中，茅草密林之间。他们勇敢、机智，洒热血、抛头颅，忠于党，热爱人民，他们用他们的血汗和生命，开辟了一条革命的胜利道路。

这部书里，有不少篇幅写到陈毅同志的际遇和行动，他的英姿丰采，音容笑貌和他的许多讲话。陈毅同志的语言是生动的，诙谐而又发人深省，一针见血，极有性格。在陈毅同志留下的诗篇之中，特别有一篇《赣南游击词》是以形象思维，吟唱了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斗生涯的。丕显同志在这部书里，尤其在第六章、第八章里，用了许多具体的事迹和生动的范例，为这一篇词作了周密的诠注。这就使读者更能体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何等的艰苦，如何地重要了。

正是红军主力的北上抗日，南方八省的游击战争，加上东北义勇军的浴血抵抗和长城线上的保卫战斗，打响了全国性的抗日枪声，又有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紧密配合，使得蒋介石日夜被抗日烽火所围困，既不能阻止红军主力北上，更无法抑制游击队的英勇活动，最后不得不参加在全民抗战之中了。

正是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并在尔后的三年中，保存和卫护好革命的火种，使它不灭地燃烧，终成燎原之势。它飘扬起鲜红的旗帜，坚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为我党锻炼了一批骨干，逐步发展而成为伟大的革命武装。正如长征红军是八路军的前身，南方游击队后来成为新四军。

这部书是一千个日日夜夜的活生生的可泣可歌的记录。读者们可以看到红军游击队怎样在远离党中央的敌后，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了面临着的一切困难问题，怎样依靠着人民群众的力量，粉碎了装备优良的超过我三五十倍的敌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

丕显同志以赣粤边斗争的亲身经历为主，结合各地游击区同志的回忆素材，而写出的这部书，是一部好书。当时，中央指定的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是在那里的，党的领导核心机关也就在那里，丕显同志也正好在那里，所以他记述他亲身经历过的斗争是可以代表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相当部分的。然而他很少写他自己，而更多地刻划了领导者的形象以及战士和人民的群象。这部书是以编年史的方式写的，具有相当的概括力，寓一般于个别中，能使读者对当时重要的决策如何形成，革命群众如何贯彻执行它们，从而对于三年战争的全局，有所认识。

然而当时各个游击区都有它们自己的一些特点和重点。比如有的地区，是集中兵方向四面八方出击的，在蒋介石的主力赶不到的地方，消灭了许多地主武装。这对蒋占区人民是有力的鼓舞，自己虽也受到一些损失，却推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另一些地区，是属于老区了，是十多年来的游击区，那里的地主武装和保甲长几乎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上，我们的行动主要对付蒋介石的主力军，这些主力军的行动总是有弱点的。我们及时掌握了这些弱点，就能不失时机，一个个地消灭敌人的主力。

当年我是和张鼎丞、邓子恢等同志在一起的。我们始终在闽西和敌人周旋着。虽然各个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给敌人切断了，但我们大家都经受了共同的严峻考验，遭遇是相同的，始终患难与共，是互相支援着的，呼吸相通，同声共气。所以读了这部书，当年的战斗情景又展现在我眼前。我感到有责任将它推荐给读者。

红军的长征用了一年时间，行程两万五千里。南方的游击战争用了三年时间，斗争的艰苦也是无奇不有的。但我们的指战员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这是毛泽东同志从建立革命军队以来一直没有放松过的政治思想教育的结果。革命的军队是在革命的实践中考验自己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青年同志读一读这部书吧，这对我们艰苦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将是有益处的。

谭震林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一日

目 录

序 言	谭震林
第一章 转折	(1)
第二章 突围	(11)
第三章 会合	(21)
第四章 新起点	(29)
第五章 北山事件	(35)
第六章 反“清剿”	(46)
第七章 扎根	(59)
第八章 反搜山	(68)
第九章 大发展	(79)
第十章 “两面政权”	(89)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100)
第十二章 突变	(110)
第十三章 谈判	(119)
第十四章 集中	(129)
第十五章 下山	(135)
后 记	(144)

第一章 转折

—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赣南，正是秋高气爽桂子飘香时节。可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红军主力被迫作战略转移。悲壮的气氛弥漫于中央革命根据地。

对于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是在非常匆忙中作出的决定，作出之后，既没有向领导干部说明情况，更没有向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作好动员。相反地，他们以所谓军事上要保密，强调要等红军主力渡过赣江，进入白区以后，才准许宣布红军主力转移的消息。因此，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何日出动？将去何方？是否很快就会回来？红军主力走了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将怎么办？这些人人深切关注的问题，可谁也不知道，大家都被闷在鼓里。甚至当时身为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也不知道。

陈毅是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兴国战役中，坐骨中弹受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的。他的坐骨碎片，如不开刀取出来，伤就难以治好。医院里虽然是有爱克斯光机的，却没有电，照不成片子就开不了刀。他住院已一个多月，这问题还解决不了。

十月九日，中央军委周恩来主席到医院探望陈毅同志。他来到陈毅的病床前，并告诉他：红军主力就要走了。中央决定让项英和你们一些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要你留下来是因为你能打仗，

懂得军事,可以帮助项英。而且你伤势未愈,不能远征。现在你的伤到底怎么样了?他这样问。这才发现陈毅需要拍爱克斯光的片子,但没有电,不能拍。恩来同志立即派人去把电台的一架发电机抬到医院里来。这架已经包装好准备随军长征的爱克斯光机器,被重新解开,马上发电,由医生拍了照片。看清了碎骨部位,当场给陈毅做了手术。

就在探望中,周恩来给陈毅讲了中央的决定: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同志组成。项英同志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并兼政委,贺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陈毅同志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十月十日晨,我红军主力的指战员们,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告别红色的土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留下的同志们,和长征的战友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夹道送别亲人,千叮万嘱,热泪沾襟。

十月十二日那天,阴霾满空,炮声隆隆,陈毅半躺在病床上,心情异常地焦急。正好项英派来了担架,即刻把他接回机关。项英给他传达了中央的部署,并且和他商讨今后的斗争大计。当时留下来的红军,计有:

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

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

赣南军区的六团;

闽西军区的三个团;

杨(殷)赣(州)军分区的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加上各县独

立营；

以上共有武装力量三、四万人。瑞金、会昌、于都、宁都等县的“三角地区”，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他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

陈毅听了项英的传达，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当时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几十大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十几大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瞬息之间，黑云压境，敌军群集，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可是项英同志认为形势很好，还要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陈毅同志则认为，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项英却把陈毅的清醒估计，说成是他“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但是对那种不清醒地估计当前形势，不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强大，看不到革命低潮到来的错误认识，才大失所望呢。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共青团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不久，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本来我以为会跟红军主力走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对项英，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陈毅，我看见过，感到他看问题敏锐，胸怀坦白，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很愿意在他们领导下工作。那次是他们第一次商讨，我并没有在场。但是事后得悉，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对形势的估

量和斗争的部署，他们是存在着原则的分歧的。

项英一直把希望寄托在想象中的红军主力大捷上。他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边，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等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的革命根据地。”

陈毅提醒他说，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还留在这里专门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陈毅提出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陈毅同志是说得很有道理的。记得一九三五年新年时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他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呛着。当时我感到十分惆怅，象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但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把“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部队的中心宣传口号提出来。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兵工厂，迷恋于旧的形式，企图再搞起个大的革命根据地。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象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各个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却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将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要同敌人打硬仗。他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再加上七个团，这十个团可以

消灭敌人一个师。”

陈毅不赞成这种做法，说：“请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的。”他认为过去那一套大规模根据地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全都要收起来。大家背起快枪打游击去，不要让敌人找到目标。

项英不以为然。他是书记、司令员兼政委，重大问题最后必须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在这转折的紧要关头，竟然错过了大好的时机。那时，国民党的军队，因为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吃过苦头，被我们打怕了，一时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贸然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急进。加上他们对红军主力的转移，曾作过种种判断，耽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北路敌人仍然用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战法，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进；而南路敌人则已撤回广东。这个时机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实行分散打游击的转变。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特别遗憾的是，项英还按照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意图，一度把政治军事形势秘密封锁，使干部和群众不懂得面临的局面多么严重。有些同志根据以往的经验，天真地以为红军主力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归来。工农剧社的演员，还天天忙着创作、排练，准备演出，庆祝胜利。他们操琴、练歌，唱的是“胜利的号炮”（这是歌词中的一句重句）。那时，我们还参加过工农剧社的晚会，有民歌、独唱、舞蹈和话剧。天下着雨，群众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看演出，真是一派“升平气象”！

二

形势不出陈毅所料，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了。

十月二十六日，敌人侵占宁都。

十一月十日，敌人侵占瑞金。

十一月十七日，敌人侵占于都。

十一月二十三日，敌人侵占会昌。

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

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方面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我们。

敌人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清剿”。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被反动派杀害的人数达七十余万。

那些穷凶极恶、暴戾恣睢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恶霸地主，趾高气扬、气焰嚣张地对贫雇农说：“你们红得一世？”贫雇农响亮地回答：“你们白也白一生勿得（意思是也白不了一世）！”他们坚信：“只要穷人不妥协，总有一日见红天。”

这时项英同志依旧傲视敌人的暂时强大，仍然集中兵力，要和敌人死打硬拚。十一月二十一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了东路的敌第三师。这一仗虽然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失策的是暴露了自己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的目标，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敌人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跟踪红二十四师，使我们陷于更加困难的被动局面之中。

湾塘岗战斗的教训，迫使中央分局进行了新的布置，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张鼎丞同志回到闽西，钟循仁同志去了闽赣，胡海同志回到东固。另外一部分干部调往地方武装中去，

以加强各地区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转变只是局部的。

不久，南路敌军由广东边境回防赣南，从东、南两面向我“最后坚持阵地”进攻，与北路敌军配合，南北合围，拉网夹击。我二十四师、独立三团和十一团，在狙击战中未能取胜。后在牛岭战斗中，以五个团的兵力去攻打一个团上下的敌军，却被各个击破，遭到惨败，所谓“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

十一月底，在中央分局的会议上，陈毅提出了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接着，形势更加严重了，项英终于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个指示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和贺昌三位同志保持领导，其他成员都分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个游击区。分局和一部分部队，赣南省党政机关和部队，则都转移到仁风地区，待请示中央后再确定行动方针。

陈毅写出了指示，但这时已是年底，许多地区已被敌人隔断，无法联系，指示精神就没有传达下去。

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大风暴临头了。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和赣南省的机关和部队已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风地区，形势非常紧张。战士和群众正在山腰上，在深谷里挖战壕、筑工事，埋藏物资，坚壁清野。

这天傍晚，我向山腰上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赣南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鼓动员唐大炮的声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战士们说话：现在是国民党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最后一次决战，等红军主力大捷，我们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捣蒋介石的老窝！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话的。他一转身发现我已经站在他的身旁，情绪显得更加活跃。

战士们纷纷围拢前来，问这问那。有个战士问：敌人到底有多少？我们能不能赶走它？唐大炮一听这话就开炮了：你这个脑袋，我看真该检查检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敌人千军万马，只怕自己脑袋有问题。

这时一个久经风霜的老战士老党员黄兴洪说话了，他说：“大炮说的脑袋问题很值得注意，但是，到底谁的脑袋有问题，需要辨别。我看大炮的决战呵，反攻呵，都是他自己的马列主义，是否也需要检查检查呢？”

唐大炮显然被激怒了，他立即反驳：什么是我的马列主义，什么是你的马列主义？黄兴洪吸一口旱烟回答：讲道理我不行，讲打仗还可以说一点。我们白手起家，创造了根据地，靠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发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声东击西，都是成功经验。现在把各地部队拉到这里来集中，让敌人包围我们。没有游击队牵制敌人，我们这样硬拚行吗？

两人一争，我很受感动。我就说：目前的环境是困难的，你们讨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看是要面对现实，才能战胜困难。兴洪同志的意见我以为是对的。唐大炮未免过份乐观了。到底怎样行动，仗怎样打？听候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吧。他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人民中有威望，是群众信得过的领导人。

我回到营地后，那晚上睡得很迟，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袋里也尽是傍晚的争论问题。唐大炮是学生出身，他看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指示，说的话也并不是乱说的。黄兴洪同志是瑞金武阳附近的农民，经过长期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他提出部队过份集中的问题，值得深思，他是我们赣南军区直属团的一个连长。那晚上我百感丛生，但我至今还鲜明地记得我是反对唐大炮，赞成黄兴洪的意见的。

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听到东南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敌人已迫近

我们的指挥中心了。我赶到了工农剧社那里去开一个会，因为忘记了开路条，半路还给儿童团的岗哨喊住，受了他们一顿盘查。

会议一开始，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报告。我记得他说的是“目前的战争，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来一个大转变”。

我真没有想到在一夜之间，局势已急转直下。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我开完会回到赣南军区司令部，迎面见到军区司令员蔡会文。他已派了几个通讯员去找过我了。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一间屋子里，给我传达了党中央头天发给中央分局的两份电报。正是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党中央的声音越过崇山峻岭而来到了。

党中央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党中央的另一份电报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革命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等等。

蔡会文同志对我说：中央分局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了中央的电报指示。陈毅同志说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英同志已接受了陈毅同志的意见。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的具体部署是：

(1) 独立红七团随李才莲同志由会昌穿过封锁线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县(宁都)以北，开展游击战争；

(2) 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随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到闽西与张鼎丞同志的队伍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游击战争；

(3)由汪金祥同志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4)由李天柱、孙发力等同志率红二十四师的四个连，依靠寻南原有的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同志取得联系；

(5)派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向于都南挺进，建立于南游击区，并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由龚楚(后叛变)、石友生率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约九个连)，从南安江、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由徐鸣同志率红军独立第三团，到湘赣边传达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8)留红军独立第六团在赣南，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同志领导的赣南军区指挥，进行游击战争；

(9)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直接统率红七十团(周建平为团长，杨其为政委)，在根据地穿插游击，并与各根据地取得联系，指导工作。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委员陈毅、贺昌同志，随红七十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派到各地和各部队去工作。

最后，蔡会文同志对我望了一望，象征求我的意见似地说，“你跟我一路走，你高兴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危机已经达到了顶点，转折的过程已告完成，最后的突围就开始了。

第二章 突 围

一

“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重围突破万千重，挥戈直指油山中。”

事隔四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我们最后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情景时，当年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同志写的这首激情澎湃的诗，便又在我耳边萦绕回响。

一九三五年二月，装备很好的敌人，数十倍于我，四面麇集，形成坚固的包围圈，步步向我进逼，形势越来越危急。中央革命根据地各路部队，在统一指挥下向外突围。留在仁风山区的，最后还有两路兵马：一路是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另一路就是我们赣南省党政军机关率领的独立六团。此外，还有二千多名重伤员。因他们行动不便，势难一同突围，只好进行疏散，择地埋伏。可是，他们斗志旺盛，要动员他们疏散，这工作相当难做。经过研究，项英同志就请陈毅同志去解决这个难题。陈毅同志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又善于做说服工作，而且他本人就是伤员，由他去动员疏散是最合适的。

陈毅同志拄着拐棍，步履维艰地走到伤员们的住地。大家看到拐步而来的陈毅同志，心里就非常高兴。陈毅同志首先亲切地问候大家，然后心情沉重地向大家讲：中央革命根据地暂时失败了，非转移不可，但中国革命肯定要胜利。革命的火种是扑灭不了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险恶，因此对伤员要进行疏散、转移，同志们可以回家或者到老百姓家去，打游击也

好，种田也好，待革命形势好转时，欢迎大家重回部队。接着又讲：同志们疏散以后，要特别珍重，我们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万一遇到敌人，要不怕牺牲，不幸而非牺牲不可时，也只能牺牲自己，千万不能叛变。我们牺牲了，只要有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伤员们听了，都难以抑制自己的内心激动。有的说：“只要革命有希望，我们就安心留下来。”有的说：“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敌人。”在面临如此严重危险的时候，只有最坚强的战士，才会有这种英雄的气概。

接着，陈毅派人把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请来，把重伤员交给他们，亲切地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他们都很年轻，要他们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

群众和红军战士是血肉相连的，他们听了陈毅出自肺腑的讲话，纷纷拥上前来，把伤员当作自己的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半天功夫，两千多名重伤员就疏散完了。除给每个伤员发给几块银元和一些药品外，陈毅还给接待伤员的群众，每家送去五斤盐。那时敌人封锁很严，盐是很珍贵的。

三月三日午后一点多钟，赣南省军区司令部吹起了紧急集合号。我匆匆地跟着大家奔向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有高大的松树，稀疏的毛竹，还有数不清的杂乱的灌木和茶梓，是个天然的林荫地带。在这里听报告，不易被敌机发现，比较安全。

这次到会的人特别多。司令部、政治部、直属团队都到了，还有少先队、儿童团和一些基本群众。

项英、陈毅都讲了话，他们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险恶的，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杀开一条血路，突到敌人包围圈以外去，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新的胜利。

我们这最后两路，向哪里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同志曾在一起作过分析。陈毅向大家介绍了他们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定的突围方向——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那里敌人虽强，但我群众基础也很好。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那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里又成立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同志任特委副书记，他们带着特委机关和一支游击队，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这时，陈毅深情地望着我们每个人的面孔，从容地说：“红军的干部战士都应该是革命的英雄。胜利的时候要当英雄，困难的时候更要当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从困难中锻炼出来的，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二

三月四日，我们赣南党政军机关率领独立六团这一路突围部队一千八百多人，离开仁风山区开始突围。我也在这一路中间。

突围前，作战经验丰富、机敏勇敢的蔡会文司令员对大家说：这次突围的任务很艰巨。由马岭到观音渡一线的敌人是广东军余汉谋部，在数量上五倍于我，装备很好。他们用堡垒严密控制的地方，正是我们必经之路。我们要冲过云河、马岭和牛岭这三个主要关口，尤其是牛岭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可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部队才能通过。

蔡司令员决定：以一部分队伍为先头部队，并指定重机枪连到牛岭就要抢占制高点，以掩护先头部队，拿下敌人第三号堡垒；省军区司令部、省级机关和警卫连，编在队伍中间；另一部分队伍，在后面担任后卫和做收容工作。

接着，蔡司令员把在高虎埡战斗中立过功的、光荣连的一班班长余虎同志找来，推着他的胳膊对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说：“啸仙

同志，你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体不大好，行军不大方便，我给你多找了一个警卫员。”余虎一个立正敬礼。嘯仙同志连说：“好极了，好极了！”

三月四日下午，部队刚出发，就遇上了倾盆大雨。我们在黎板桥吃过晚饭后，没有怎么休息就继续前进。夜里，天空布满了乌云，没有一点星光，伸手不见五指。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走进了山谷，又翻过了山腰，沿着羊肠小道蜿蜒前进。当走近一个村庄时，突然响起了“啪”、“啪”的枪声，我们先头部队马上向两旁散开，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侦察班进入村庄搜索，才知道那是一些流氓地痞组成的“靖卫团”，误以为我们是白军，鸣枪以示“欢迎”。

蔡司令员听了侦察班的报告，笑了一笑，说：“在白军进攻时，神神鬼鬼都出来了。好吧，我们来个‘顺手牵羊’，把他们一网打尽。”黄兴洪连长说：“已经解决了。俘虏了二、三十人，还有几支烂枪。请司令员指示如何处理。”蔡司令员说：“为首作恶的从严，胁从的从宽。”

队伍继续前进。

天黑、路滑，山路实在难走。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来，但没有叫苦的。队伍到达马岭附近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稍事休息，吃了点干粮，即进入战斗准备。

东方刚刚露出曙色，战斗就打响了。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压住敌人的堡垒。机关枪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先头部队如龙似虎，猛打猛冲，迅速地越过了牛岭、马岭这两道关口。

但是，当紧跟在他们后面的省党政军机关这一部分队伍越过牛岭时，却遭到了敌人的伏击。敌人凭借他的优势兵力和堡垒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击，弹如雨下。接着，敌人从堡垒后面蜂涌而出，象疯狗似的猛扑过来，把我们的队伍拦腰切断了。

在众寡悬殊的情势下，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中。年轻英俊的蔡

司令员，沉着而机智地指挥作战。他命令早已抢占牛岭以东高地的重机枪连，用炽烈的火力从侧背打击敌人，接应后续部队前进；命令狙击班从西面斜刺里插向敌人的第三号堡垒，坚决把它摧毁。

出发前调到狙击班的唐大炮和战士们，匍匐前进，登上山坡，趁敌人寻找目标的间隙，紧冲十来步，迅速接近堡垒。唐大炮把绑在一起的两颗手榴弹，塞进了三号堡垒。随着轰隆一声，三号堡垒就哑然无声了。

“这下干得够本啦！起码五十个。”唐大炮手里拿着一挺快慢机枪，朝着溃退的敌人大声地说。

他的话音刚落，“嗖”的一声枪响，我们英勇的唐大炮应声倒下了！

悲恸呵！唐大炮牺牲了。狙击班班长拿过唐大炮遗留下来的武器，向反扑过来的敌人一阵猛扫。这个突然的反击，顿时使堡垒前敌尸累累。敌人这时已感到侧面的严重威胁，就用机关枪、步枪向三号堡垒的缺口密集射击，子弹象飞蝗一样，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我跟着蔡司令员，时而匍伏，时而前进。突然，他举起手臂，往西一挥，发出命令：“朝这个方向冲，猛冲！”黄兴洪连长和警卫班的战士们照着蔡司令员指挥的方向，拚死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东面的高地；然后用机枪、步枪组成的火力，接应后续部队突围。

正在这个时候，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不幸负伤了。他个子魁伟，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着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地跳下来，带着同志们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第一号堡垒和第三号堡垒。当他们冲出山坳到达信丰的唐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一颗流弹击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这时，他的警卫员准备架着他走。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手搭上自己的肩膀，警卫员也中弹倒下了。刘伯坚就向蜂涌而来的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

魔掌。

黄昏，枪声渐渐稀落。经过一天的激战和急行军，马岭和牛岭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天黑了，雨还在下着。象头天晚上一样，没有一点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天然目标。蔡司令员凭着风雨刮来的方向，看着指北针上微弱的荧光，来确定前进的路线。我紧紧跟在蔡会文同志的后面，幸亏他个子高，依稀看得见他的身影。我就跟着他的身影前进。羊肠小道上满是泥浆、断树、草丛和石块，战士们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走去。天色将明，部队来到一座密林里，蔡司令员命令停下来休息，布置警卫班在山上警戒，侦察班下山侦察。这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顿时感到饥肠辘辘，寒气砭骨。经过一天激战，又走了一夜的路，无力的双眼，不时地自动瞌下来。大家随便吃了点干粮，就地铺一层松毛作床，摆一块石头作枕，倒头便睡了。

天亮了，侦察班和跟随阮啸仙同志的警卫员余虎，从山间小径飞奔而上。余虎见到蔡司令员，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报告司令员，我们首长牺牲了。”他的两眼深陷，满脸血污，泪和着血，滚滚而下。

蔡司令员听了一惊，跨前几步，紧握余虎的手，忍着悲痛说：“什么？快说！”

“首长长期带病，身体本来虚弱，连日急行军，十分劳累。当他走近牛岭时，气喘病又发作了，不得不停了下来。战斗开始时，首长带病指挥，鼓励战士们奋勇作战。忽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喘着气，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倒下了。我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地上流着一大滩血……。”

蔡司令员望着远方，脸色阴沉。他轻声地说：“圣地理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

们留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阮啸仙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政治教员。他参与领导了广东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先后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委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他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地为党工作，以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经过几天几夜的战斗，我们这支一千八百多人的队伍被打散，只剩下八十多人了。我对蔡司令员说：“你这个司令员，变成个连长了。”他用坚毅的眼光望着我，笑了笑。

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夜行晓宿，行进在桃江之畔的丛山中。这一带是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到处有反动地主的堡垒，“靖卫团”在前面拦路，强敌在后面跟踪追击。敌人在盲目搜山，乱放冷枪，为自己壮胆；入夜，地主武装的岗哨活动起来，庄庄火把通明，处处鸣锣呐喊，有时还放上一阵土炮。蔡司令员指挥部队避实就虚，翻山越岭，朝西南方向前进。夜深了，我们继续不停地走着。饥饿疲乏，又是黑里摸路。我的双腿再也撑不住了。忽然脚尖好象碰到了什么东西，摔了一跤，倒清醒了不少。忍痛爬起来，强使双腿不断向前移动。这时大家都很疲劳，队伍里走在后面的同志，撞了前面同志的脊梁，只觉得脑袋里“古冬”一响，猛然醒来，才晓得自己还在走路。

天将破晓，远处传来鸡鸣。我们从山径陡坡走下平地，浑身觉得轻松得多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离这里不远就是桃江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挠红军渡江，把渡船都破坏了。我们找到当地的老表们，他们说：“我们这里过去红军常来常去。前些时候，地主豪绅回来，说是红军被消灭了。这就没有天理了，我们就

是不信。果然你们红军回来了。”

在老表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好不容易找到几只渡船。大家高兴极了，饥饿、疲乏、瞌睡，一古脑儿飞散了。

黎明，我们在王母渡顺利地渡过了桃江。一过江，就是赣粤边游击区的边缘了。蔡司令员展望桃江两岸，仰首高咏：

三月渡桃江，
江水滔滔不绝。
休道人饥马乏，
三军心似铁！

过关斩将敌胆寒，
破贼围千叠。
指顾油山在望，
喜遂风云合！

部队在挨近赣信公路的一个小山包里停下来休息。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疲劳不堪，往地上一倒，就睡得“鼾声起，梦儿迢”了。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抬头望见蔡司令员在屋场外挺直身子踱来踱去，频频向四处探望。啊！他不顾疲劳，亲自负起警戒任务呢！

我悄悄地走到他面前，低声地说：“你也应该休息一下了！”

“阿丕同志，我们可找到了大龙区委。余虎已经出去联系了！”他面露喜色，好象根本没有听到我说什么，只管告诉我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过了片刻，余虎引来大龙区委负责同志，蔡司令员和我会见了

他，他指点着山影对我们说：“那些高高的山峰就是我们英雄的游击根据地油山！只要两天的路程，就可以到达油山的中心区了！”

油山，梦寐以求的油山，在那蜿蜒不尽的梅岭山脉中，已经隐约可见了。大伙儿的眼角上挂着喜悦的泪珠，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大龙区委负责同志还亲切地说：“这里是游击区边缘，有我们的群众，他们已给你们弄来一些吃的东西。”

果然，不一会工夫，我们吃上了群众送来的米饭、稀饭、山芋，大家已经捱了几天饿，吃起来感到格外香甜。

刚吃罢饭，区委负责同志又送来了十几包香烟，笑嘻嘻地说：“我知道大家很需要这个东西，是托人往大庄里弄来的，可惜只弄到这一些。”

“好极了！你真想得周到啊！”

战士们分吸了香烟，精神一振，轻声地说笑，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经过一夜休整，黎明时部队继续行军。越过赣信公路，进入了长安区。沿途都有交通员和群众带路。逢山爬山，遇水涉水，夜行晓宿，向着赣粤边的中心地区行进。途中，蔡司令员口占《突围行军纪事》一首：

料峭春寒浓，
强敌跟踪，
夜行山谷月朦胧；
林密坑深惊敌胆，
莫辨西东。

血染遍山红，

士气豪雄，
餐风饮露志若虹；
倦卧茅丛石作枕，
若醉春风！

第三章 会 合

一

又是艰苦的长行军。一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油山，与原来坚持在油山战斗的同志们会合了。虽然大家满身是战火的烟尘，但是眉宇间依然闪现着坚定的、胜利的光辉。油山的同志们抢上前来替我们背东西，一边走，一边问长问短。许多同志的眼角里挂着晶莹的泪花。附近的群众，也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拥上前来，热烈地欢迎我们。

在苍茫的暮色中，部队来到一座密密的丛林里。赣粤边特委机关就设在松竹掩映的几间房子里。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共青团特委书记刘新潮等同志，都在特委机关附近热烈地欢迎我们。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特委机关还见到了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见到了曾纪才同志。我们紧紧地握手，互相拍着对方肩膀，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离开仁风山区的这些天来，我们一直为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担心，谁知他们却比我们先到达油山，悬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诉说，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嗓子里象是被什么东西哽着，一时又说不出话来。项英、陈毅同志对我们表示亲切的慰问，陈毅同志还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大家都为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房子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

二

这时我们才知道项英、陈毅等同志的突围情况。他们和贺昌同志以及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带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是在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之后，不久就离开仁风山区的。

他们突围前，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情况非常危急。但是，项英、陈毅同志仍决定先发个电报向党中央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部队分路突围的部署。

三月四日下午一点钟，最后突围的部队集合起来了。但直到三点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报务员急得汗水淋漓。贺昌同志很着急，带着两个营先走了。出发不久，就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被打散了。后来，贺昌同志转移到会昌的石舍村，把打散的部队收拢起来，他对大家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心的时候，是考验对党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每个同志都要不避艰险，冲出重围去！”

刚收拢来的部队，奋勇地渡过了会昌河。可是，他们一上岸，就被埋伏在岸边的敌人包围了。部队打了很久，还是打不出去，最后又被打散了，贺昌同志身负重伤。这时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同志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用他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显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贺昌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委员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政治部主任。牺牲时，仅二十九岁。

电键哒哒地响着，时间一分一秒地在移动，天渐渐地阴下来了。项英、陈毅同志一直守在电台旁边，守到下午四点多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仁风山下响着敌人的枪声，部队焦急地等

待着。

下午五点钟，电台突然发出强劲的呼号，电台终于叫通了！电键紧张地跳动，把突围的部署报告了党中央，同时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密码换了，电码翻译不出来，还是不知道中央回电的内容。于是，项英、陈毅同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便同中央断了联系。

晚上，项英和陈毅同志带着一个营出发。刚起步便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走几步，跌一跤，走了两个钟头，一问，才走了五里路。

好容易下了山，走到一个庄子前面，便和敌人遭遇了。三百多人的队伍被打散，项英、陈毅同志也被分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合在一起，部队也集合到二百多人。他们就东奔西走，和敌人绕圈子。到了晚上，又和敌人碰上了，部队再次被打散。这时，有个家伙叛变了，敌人把他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项英眼睛近视，夜里不能走路；陈毅腿受重伤，不能行走，要是抓到他们，赏洋五万元。

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部队压力，缩小行动目标，部队决定由另外几位同志指挥；项英和陈毅同志则带着少数警卫战士，另行突围。

项英、陈毅等同志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准备在山下暂作隐蔽。这时无意中碰见一个人。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头戴一顶破钢盔。他沿途拿着这个钢盔煮饭，所以钢盔外面有烟灰。他见到陈毅同志，一把抓住，叫声：“首长啊，首长！”便放声大哭起来。

他就是曾纪才同志。一九二九年陈毅同志在赣粤边组建红二

十二军时，他是赣粤边牛颈区区委书记。当时，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参军，带动许多青壮年也来参军。红二十二军开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又被调回地方，担任当时新建的代英县的县委书记。

陈毅同志紧紧地握着曾纪才同志的手，亲切地安慰他，劝他不要哭，问他怎么到仁风山区来的？他说：“我在代英县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送往外地。走到半路，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后，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为什么不回家乡去？”陈毅同志问。

“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曾纪才激动地讲了他的遭遇，接着说：“听说红军主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仁风山来了。我拿着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平时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现在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同志怀着战友的情谊，劝慰他说：“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了，将来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要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同志的眼睛里流露出朴实和热诚的光辉，感情深沉地说：“革命中发生的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失去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账不应该。要挽救失败，希望将来重新做个结论。”

陈毅同志爱抚地望着这个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我虽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同志把他们的突围计划告诉了他，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他说：“路我熟哇。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项英、陈毅等同志便由曾纪才同志带领，从仁风山区向油山转移。

这时候，仁风山区到处是敌人。他们便钻进大山里躲藏起来。在山上，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喊叫声，只有落雨的时候才清静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山上躲了一天。等到敌人收缩时，才趁机下山，混在一群挑担赶墟的老百姓里面，偷偷地渡过了桃江，到了王母渡。这里离曾纪才同志的家乡很近，他想回家去摸点情况。项英、陈毅同志问他，你家里的人不是被国民党杀害了吗？他说：剩下个老丈母娘还在。他们都认为他应当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并愿意和他一道去。这天夜里，他们几个人从隐蔽的地点摸黑走了十来里路，来到她的家门口。曾纪才上前敲门，说他从河东那边来，谁知敲了半天，他丈母娘始终不答理。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留话说，希望她看在已经牺牲的女儿的面上，明天早上能到他们隐蔽的地点见见面。

第二天天麻麻亮，曾纪才的丈母娘提着个竹篮，左顾右盼，小

心翼翼地寻到他们隐蔽的地点来。曾纪才见她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就出来和她招呼。她见到自己的女婿，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告诉他，自从红军主力走了以后，国民党常常冒充回来的红军，半夜敲老百姓的门，谁要是开了门，全家就遭殃。她说，昨晚虽听出是你的声音，但是生怕上当受骗，几次想开门，终又忍住了。曾纪才引她和项英、陈毅见了面。见面时，她劝他们白天不要出来，晚上可到她家里来休息。说罢，她把竹篮里的饭留下来，便悄悄地回去了。

当天夜里，他们摸到她的家里，吃了顿饱饭，从她那里得知长安墟有个木匠是地下党员，还靠得住。他们一口气走了八十里路，找到那木匠，通过他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他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历尽艰苦，几经辗转，终于胜利到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此后，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了赣粤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油山便成了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中心区域。

陈毅同志到达油山后，几次对我说：“这次行动，多亏了曾纪才。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上搞左的一套，把他搞错了，但他对党从不抱怨。”

四

当我们在油山同项英、陈毅等同志会合的时候，胜利的喜悦同沉痛的心情是交织在一起的。谁也不会忘记，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部队，出发时有一千八百多人，到达大龙时，只剩下八十多人！以后，陆续来到油山会合，总共才三百多人，而大部分同志被打散了，或者壮烈地牺牲了。大家对牺牲的同志，无不表示深切的悼念。特别是阮啸仙、贺昌两位领导同志的牺牲，更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陈毅同志满怀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写了首《哭阮啸

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
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
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
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
独我得生全。

在我们到达油山后不久，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伯坚同志牺牲了。原来，他在突围途中，因伤重被俘，他抱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国民党就把他解往大余。先解到粤军第一军军部，关押在大余县监狱里，后来又把他转移到伪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他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这首用生命写成的诗，是从心底里喷涌出来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在壮丽斗争中的慷慨高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钢铁誓言！今天我们展诵其诗，如见其人。他那矢志共产主义事业的情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三月二十一日，刘伯坚同志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年四十岁。他在就义前，写给亲友的遗书中，把自己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民族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赴苏联学习，于一九二六年回国，党派他任冯玉祥先生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人诗赞他：“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百战何尝计苦乐，劳生为解万民忧。”

第四章 新起点

一

油山地处赣粤两省边界。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那高插入云的峰峦，挺立着参天的古树，漫山是青翠的竹林，齐腰深的茅草。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早在一九二五年，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一九二六年冬和一九二七年春，南康、信丰、赣县、上犹、崇义、龙南和南雄等县，先后建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经过这里，给群众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到了一九二八年，这些县先后建立了工农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武装，其中的红二十六纵队，后来就成为陈毅同志组建的红二十二军的一部分。

一九三〇年三月，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同志率红四军转战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在大余县第十四中学召开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赣粤边区的革命斗争。

年年征战，岁岁烽烟，直至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赣粤边区就成了游击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西南屏障。到长征开始时，这里也给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以有力的支援。而当我们突围部队到达油山之后，它便成为敌人瞩目的中心了。

在军事上，敌人以超过我们三、四倍的兵力，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和封锁。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整顿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

坐法，张贴“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反动布告，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在经济上，他们控制墟场集市，采取各种限制买卖的措施，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因此，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但是，在敌人的内部，也不是无隙可乘的。广东军阀、驻赣绥靖司令部的司令官余汉谋，想利用“剿共”，乘机把赣南变成他的势力范围，而蒋介石既想利用他“剿共”，又暗中防备他再向北扩充势力，因此，余与蒋介石之间，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摩擦。我们就在这几种敌人势力的接合处的缝隙间，利用矛盾，穿来穿去，神出鬼没，开展活动。我们在油山地区先后开辟了五个游击区：

油山区——位于江西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处。这里山岭连绵，形势险峻。山谷里散布着小村庄和稻田，世代居住着劳动人民，这是赣粤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北山区——在南雄西北帽子峰的周围。这里有很大的原始森林，走上几天都看不见天；

信丰、南康、赣县区——中心在大龙，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人口相当稠密；

南山区——在龙南、全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

上犹、崇义区——在赣粤湘三省交界处，大部分是森林地带。

我们这五个游击区，既远离长征的红军主力，又跟南方八省的其他游击区完全隔断，就象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一样。

二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死打硬拚的盲动主义情绪。突出的是原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后叛变），曾经以极左的面孔，别有用心地说：“中央革命

根据地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早在我们上油山之前，他曾经不顾实际，坚持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把军分区的部队，摆开了队伍，吹号集合，点名出发，要和敌人硬碰硬。结果，大队人马一行动，很快就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马上派重兵来“剿”，搞得游击队天天转移，很被动。

当时，也有的同志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他们说：“红军主力不派队伍回来，我们就不能和敌人作战，作战就要失败。”

当革命处在低潮的时候，出现这种悲观失望情绪，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的心目中，这次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失败，把一个好端端的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希望在于长征的红军主力，可是，自从红军主力离开遵义以后，现在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游击队困顿空山，人少地薄，能否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究竟有没有前途？

记得当时国民党报纸称陈毅同志为“陈毅股匪”。有的同志就问：“‘陈毅股’是谁？”陈毅同志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改称为“陈毅散匪”。那个同志又问：“‘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同志答：“还是我。”那个同志奇怪地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同志笑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三

一九三五年四月，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刘新潮同志和我，带着侦察排，从油山转移到北山。不久，又在油山脚下的长岭，

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全体会议。陈毅同志针对指战员中的悲观失望情绪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暂时的退却。但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他们占领了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

陈毅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给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他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他还风趣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下山，总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但他也提醒我们：“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同志也反对盲动主义情绪，不赞成同敌人死打硬拚。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拚，拚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并强调说：“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毅同志还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并且针对一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的同志习惯于正规的一套做法，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情况，陈毅同志提出了虚心向本地同志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本地同志向外来同志学习。他说：“两方面的同志各有长短，要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的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央革命根据地虽被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悲观情绪是错误的。”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

项英、陈毅同志的讲话，象是拨开了油山的云雾，使我们在众说纷纭之中看清了光明的前途。我们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感到心胸开阔，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也大大加强了。

长岭会议一致通过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县委；县委以下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区委、工委和支部，共青团组织，也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起来。

长岭会议的工作方针是在反对盲动主义和反对悲观失望情绪的基础上制订的，在贯彻执行中间继续遇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阻力也并不奇怪。记得有一天晚上，项英、陈毅同志在一间老百姓的堂屋里，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到会的二十多个同志，在一盏微弱

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听着陈毅同志的发言。陈毅同志根据长岭会议的方针提出了调整部署，分散打游击的意见。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以极左面孔出现的向湘林，霍地站了起来，说他不赞成把军事力量分散，并再次搬出他那套“拚掉几个算几个”的主张，重弹“现在革命不是低潮”的老调，还说什么“红军主力马上就会打回来，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然而，这套货色很少有人赏识了。大家纷纷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是集中，又是正规，算了吧，我们吃够了这个苦！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长岭会议的方针办。”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货色收起来。

长岭会议作了分兵的部署。

由蔡会文同志率两个大队，到崇义、大余边境，向湘东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其中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使北山与蔡会文部联成一片，另一个大队到红石寨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由黄成则（队长）、张日清（政委）同志率一部分队伍，向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发展，同时加强大龙地区的工作。

还在油山地区留下部分队伍。

项英、陈毅则坐镇北山，直接领导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开展游击战争，我留下来，随他们一起活动。从此，我就同患难与共的蔡会文司令员及由他率领的部队分开了。

长岭会议确定的工作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具体运用。长岭会议成了我们的新起点。

第五章 北山事件

一

长岭会议以后，鉴于油山地区情况紧张，我指挥机关都转移到北山地区，设在那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莽莽苍苍，遮天蔽日的帽子峰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加紧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我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方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就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出重围的七十一团政委，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又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三十来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龚楚把他那支卫队伪装为“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派了由土匪周文山率领的一支百十人的反革命武装，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

象煞有介事地进行“迎击”。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一阵，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后，那些土匪武装很快就被“赶跑”了。

这样，龚楚就到处吹嘘他们“击溃”了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加上龚楚又扮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帮英勇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同志、驻在天井洞对面山上的游击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同志、游击小队长“猛张飞”，以及我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们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接项英、陈毅同志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大家感到龚楚的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可是，见他们服装很整齐，除少数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讲的一口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见此情景乃决意迅速动作，先下手为强，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到一起，来个“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同志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了。当贺敏学同志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味道不对。他转身要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逃跑，身中三弹，滚下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面皮，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同志们听了，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都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但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许多同志当场牺牲了。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往山林里

跑，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伤口的血在流，身体又饥又乏，但是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我指挥机关驻地方向爬行。爬了两天两夜，当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时候，被我交通站的同志救了起来。他们报告了天井洞发生的变故。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而被逮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官做。”何长林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翘起大拇指说：“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于是，何长林就把他们带到我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守候。

我指挥机关侦察排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出身，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担任。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人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小华、丁上淮等五位同志在从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小华同志机警地问。

何长林已从问话中听出是吴小华同志的口音，却假意问：“你是吴小华同志吗？”

“是我。”吴小华同志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已慢慢地走近来。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扭住吴小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同志。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米倒了一地，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后面的我侦察班三位同志，也急忙撂下米担，滚下山去。那个家伙朝着他们打了一阵子乱枪。

他们抓住了吴小华同志，把他佩带的手枪下掉了，还把他身上的纸烟也给搜走了。吴小华同志愤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龚楚、何长林听了，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假惺惺地把撒在地上的米，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说：“白花花的米倒在地上，太可惜了。米珠薪桂，你们出去搞米多不易啊！”

何长林与龚楚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后，对吴小华同志说：“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根据地来的。”这时，龚楚带的那支卫队，已站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何长林指着那支卫队说：“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原来，吴小华同志戴的那顶斗笠，是不久以前，从“铲共团”手里缴获的，斗笠上“铲共团”那几个字，一时还没有来得及销去。

吴小华同志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内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对付他们，便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把枪还给我。”龚楚吱吱唔唔地应付了几句。

何长林接过嘴说：“龚参谋长有重要事情向周同志和刘同志（当时项英同志化名老周，陈毅同志化名为老刘）汇报，请你给他

带路。”

吴小华同志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侦察班长，怎会不知道呢？”两个叛徒收敛了奸笑，反问道。

这时，吴小华同志感到要脱身已很困难，好在丁上淮等四位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之计。

于是，吴小华同志在前面走，两个叛徒和他们的卫队在后面跟着。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小华同志站着不愿再往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代呢？”

龚楚当即让他身边的一个家伙，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小华同志，吴接过一看，见里面压满了子弹，而且是支新枪，心中暗暗高兴。于是继续朝前走。

“司令部好多人哪，武器多不多啊！”龚楚边走边陪着笑脸探问道。

吴小华同志意识到这是在向他探听虚实，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小华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司令部的人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百十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三百来人，有四十几支驳壳枪，三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三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小华同志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那几个家伙把子弹退了出来，并要吴小华同志带着他们继续朝前走。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小华同志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小华同志答。

龚楚听了，非常恼火，但又不得不照着做。他命令他的卫队停止前进，只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着吴小华同志前进。

当吴小华同志接近岗哨时，他想尽各种办法，示意哨兵：跟来的不是好人。当他走到哨兵跟前时，喘着气，指着身后的匪徒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

哨兵朝坡下打了三枪，向指挥机关报了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这时，吴小华同志也掏出枪来射击，但没有打响。原来敌人还给他的那支新枪，撞针早已卸掉了。

敌人也开了枪。吴小华同志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了。

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却没有冲上山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仓促地命令匪徒撤走。

第二天，我们与吴小华和侦察班同志，在隐蔽的地点汇合了。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叛徒因怕山上真有那么一支河东开来的游击队，实力雄厚，不敢上来，就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到指挥机关驻的棚子去侦察，见里面一切原封未动，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吴小华同志的“空城计”成功了。

项英、陈毅同志表扬了吴小华同志的机智勇敢，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估计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指挥部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大

肆“清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

二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估计。叛徒龚楚与何长林的阴谋破产后，并不死心。他们带着反动军队在我们指挥机关驻地附近，日夜搜查；在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布下层层岗哨，严密封锁；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后来又进一步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加以杀害，使北山的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与损失。好在当时项英、陈毅同志早已经和我们一起转移了。

在我们从北山转移回到油山的途中，要经过著名的大梅关。大梅关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远看群峰耸立，绵延不绝，宛如天然的屏障。一条鹅卵石路迂回蜿蜒，直达关楼。路的两旁，青藤披蔓；油茶成林，古木参天。关口只露出一线蓝天。在关楼的南北两面，分嵌着“南粤雄关”和“岭南第一关”几个大字。越过“南粤雄关”，往下一看，就是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一条公路从大余县城伸出，弯弯曲曲地通向广东南雄。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北山后，日夜穿行在深山密林中。当我们接近南雄大余公路时，透过树丛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军火和敌军的军车，往来奔驰。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辆小汽车一掠而过，里面坐的多半是粤军第一军的军官。

我们避开公路上国民党的军车，趁一个月黑夜，悄悄地越过了公路线。在山里行军，也是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我们的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他们在山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前进的路。行军大多是在黄昏后起步，因为天太亮时，怕被敌人发现；天太黑时，又什么都看不见，不便于行动。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月光的夜晚，是最有利于行军的了。

行军中常常遇见陡壁。我们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身子底下是千丈深谷，稍一失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就手拉手，互相搀扶。也有的时候，藤子太高，我们就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上，去抓住藤子往上攀。

遇到下雨的日子，山路很滑。当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和一些年轻的战士一样，脚一打滑，马上就能抓住旁边的什么东西，把身子稳住。陈毅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又拖着一条负伤的腿，常常摔跤，有时一滑便滑到山下去了，我们打趣地说他“坐飞机”。

偷越大梅关后，我们在树林里休整了几天，才继续前进。从梅关下边前行五里，向右一拐，走进山坑，就到达仙人岭脚下了。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仙人岭时，朝北一望，大余城一带，万家灯火，好似点缀夜空的繁星，闪闪发亮；朝南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仙人岭下面，树林茂密，而山顶上却只有荒草，无法隐蔽。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大家走得实在太累时，便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直到东方露白才醒过来。醒来后，陈毅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大家正在说笑时，突然发现一只斑斓的老虎，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山洞里。也许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这只猛虎正在酣睡，当它醒来时，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侵犯我们。当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它时，它径自跑了。

不久，从山下大梅关镇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和操练的口令声。这时，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则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于是，大家就在石坳里捱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才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陈毅同志曾写有一首《偷渡梅关》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的确，月夜攀藤附葛过梅关的这段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北山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三

“北山事件”的主要教训，是如何巩固内部，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

项英、陈毅同志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陈毅同志还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按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但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他能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去了，还千方百计去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有一次，陈毅同志在会上对大家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同志这么公开一讲，

战士中间立即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北山游击队的一位侦察班长叫刘燕青，听了陈毅同志的话，坐不住了，站起来作了现身说法。原来，他表现还不错，无论侦察、作战，都很机智勇敢。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动摇逃跑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游击队来了。因为他毕竟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雇农子弟，在党的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当他一旦脱离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空虚、害怕，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刘燕青同志讲了这个过程后，陈毅同志当即表示欢迎，同时对他的动摇逃跑，也作了深刻的批评。不少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说不走了。有的还是要走，但让他走后，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

巩固内部，还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若是让品质不好的人背，便等于给他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展开民主讨论。一天，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索性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们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

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分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以后打土豪得来的钱，也由大家分开背。

巩固内部，还要靠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陈毅同志在做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彻底地讲清楚，既讲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也讲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现实是困难的。只有对当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许多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一次作报告时，他还特别强调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第六章 反“清剿”

一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敌人气势汹汹地向我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清剿”。

蒋介石以他的嫡系部队的第四十六师，驻扎在赣州、南康；并调动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三个师，军部设在大余；加上江西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调集的兵力共达三、四万人，分别部署了三道封锁线：

在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控制了所有的渡口，构成第一道封锁线；

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的公路沿线，驻军队，设据点，修碉堡，构成第二道封锁线；

在游击区周围的一系列墟镇，如南雄的乌径、大塘、邓坊、里栋，大余的黄龙、青龙、池江、新城，南康的贤女埠、龙回、禾稿、黄坭巷、李林；信丰的犀牛、黄泥排、大小窝、禾秋、九渡、小江、小河、崇仙；以及赣县的王母渡、大龙等地，都驻军扼守，构成第三道封锁线。

敌人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网，消灭红军游击队易如反掌。余汉谋曾向报界夸下了海口：“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还疯狂地叫嚣：“这一次‘清剿’，不把‘共匪’打死，也要把他们烧死，烧不死的就把他们饿死、困死。”

二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红军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队”，以

三、五人为一组，分赴各游击区，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援游击战争。

为了便于在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进行群众工作，游击队提出了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战士学会一门手艺，以做手艺为名，深入各地进行串连活动。杨尚奎同志会编篾器，他就以此作掩护，开展工作。生人来了，问他是什么人？群众回答说：“请来的篾匠。”生人见他编的篾笼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赖文泰同志是个铁匠出身，经常挑着担子走屋场，串墟镇，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进行工作。至于游击战士中不会做手艺的，就打赤脚，和群众一起劳动，帮助群众蒔田、割禾。这样，就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交朋友，结同庚，扩大革命影响，争取团结群众，逐步发展组织。后来，游击队还派了一些同志到西华山、漂塘等处的钨矿去挖矿砂，在矿工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广大群众纷纷参加了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在油山和北山游击根据地内，就组织了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五十多个。他们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作侦察，搞情报，保卫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乌径，是雄（南雄）信（信丰）公路上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当敌人开到山里进行“清剿”最紧张的时候，游击队在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在一个万籁无声的黑夜里，突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一百多里，在天亮以前赶到了乌径。这时，反共靖卫团团总邱光华和国民党区长，还在镇公所里打麻将。守卫在门口的团丁，夜里喝醉了酒，这时正在酣睡。游击队摸清情况后，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当游击队员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红军游击队在离这里很远很远的深山里，怎么会跑到我们乌径来呢？”这一次袭击，全歼了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团总邱光华。随后，红军游击队把写着红军游击队第×

支队第×大队等番号的红绿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色微明，群众看到标语，很快就传开了。有的还推波助澜，大张红军游击队的声势，搞得敌人手忙脚乱，草木皆兵，敌人只好连忙从山里把“清剿”游击队的力量，调回乌径。

接着，攻打大余游仙墟。这一仗也打得非常巧妙。游仙墟有个又高又厚的土围子，土围子里的碉堡很坚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枪眼，而土围子外面又横着一条很宽的水沟。这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朦胧的夜色笼罩着游仙墟，游击队长曾彪带着队员偷偷地来到这里。他根据白天侦察的情况，让战士们在土围子附近山坡的树林里隐蔽着。然后他带一个班，大摇大摆地从离敌人土围子不很远的地方通过。通过时，又是大声咳嗽，又是打手电筒，想方设法逗引敌人。果然，土围子里的敌人朝他们开枪了。伴随着枪声，他就“哎唷”，“痛啊！”大声呼喊起来。随后，战士们拥上去，扶着他向山坡树林走去，边走边大声说：“不好了，大队长带花了，快背着走！”土围子里的敌人听了，以为大队长真的负伤了，就立刻打开土围子的门，越过那条宽沟，冲了出来。事先埋伏在山坡树林里的游击队员，看到蛇已出洞，就猛烈开火，直打得敌人哇哇地叫。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班，缴获长短枪十余支，炸毁了碉堡，顺利结束了战斗，我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大余西华山钨矿局有个矿警队，装备比较好。一天下午，曾彪同志带领十名游击队员，头戴斗笠，腰束布巾，扁担上套着绳索，吊着饭袋、烟斗，打扮成挑砂的短工，悄悄地来到矿警队驻地附近的树林里隐蔽起来。另外，还派了两名游击队员，装扮成卖花生、糖果、香烟的小贩，专门到矿警队驻地做买卖。天近黄昏，矿警队照例在操场集合，听队长训话。当矿警队长刚刚开口训话时，隐蔽在树林里的曾彪同志，扬起手臂，叭叭！飞过两枪，那个矿警队长应声倒下。枪声就是信号。游击队员闻声冲到操场上，把那些矿警

团团包围起来，厉声喝道：“举起手来！”矿警们个个惊呆，不知所措，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俘虏。曾彪同志手执双枪，向俘虏们讲话：“我们是红军游击队，奉命前来收缴枪支。谁胆敢抗拒，子弹就不留情！”游击队员们把那些俘虏赶到一间房子里，把门反锁了起来，然后扛出枪支弹药，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标语，悄悄地离开了钨矿局。矿工们见到标语传单，奔走相告：“游击队两枪解决了矿警队！”当时余汉谋的军部就驻在大余县城里，他们得到消息，大为震惊，马上把派到北山“清剿”游击队的那些兵调回来，以安定人心。敌人哀叹说：“共产党真神呀，北山明明有一个团的游击队，就是找不到他们。”矿工们则兴高彩烈地说：“红军游击队真神呀，搞得白军团团转。”

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南雄县委给游击队送来一份紧急情报：广东敌军有三辆满载军火的汽车，明天要从曲江（韶关）开往大余。游击队得到情报后，连夜巧妙地穿过敌人的碉堡群，于拂晓前赶到南雄、大余公路边一条狭长的小山沟里埋伏下来，监视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第二天中午时分，果然有三辆军车在国民党士兵的护送下开过来了。离伏击地点只有百把米的地方，游击队就向军车猛烈开火，打得车上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个抱头鼠窜，三辆军车全被游击队缴获。游击队一面忙着运送车上的军用物资，一面给三个司机做工作，然后把他们释放。临走时，红军游击队还给了他们一叠宣传品。那三个司机回到曲江后，红军游击队神奇般袭击军车的事，便象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吓得一些土豪劣绅四处逃奔。有的逃到广州去了。在军车上，游击队还逮到一个从南雄回大余的土豪。这个土豪，花钱找门路，好容易坐上了有国民党士兵护送的军车，满以为此行万无一失，谁知半路上却碰到了这么个“倒霉”事，游击队员诙谐地给他起了个浑名：“老霉子”。

正当敌人大举“清剿”油山、北山游击队时，三南游击队政委张

日清同志奉命带领队伍乘虚南下，袭击了信丰崇仙，捕杀了反共团总张校麟和白师爷。接着，他们乘胜深入到青龙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青龙山山高林密，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地主山霸主宰一切。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采用“神出鬼没，出敌不意，麻雀战法，老鹰抓鸡”的战术，打击了当地的反动民团，镇压了那些血债累累的土豪劣绅。

青龙山下的陂头镇，离镇不远的大刘庄，有个姓吴的保长，是当地的大恶霸。他一贯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无恶不作。游击队到南山地区后，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墟口路边，设岗派哨，盘查行人，同时，他自己经常变换住处，日夜由保镖保护。这一年中秋节前夕，一个老表向游击队报告，这个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的吴保长，要回家过节。游击队对这个恶鬼的家，早进行过周密的侦察。中秋节这天，十几个游击队员，化装成卖柴的，走亲家的，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陆续来到大刘庄。天色渐暗，只见一个狗腿子歪着身子守卫在吴保长家的门口。游击队员小马，提着根扁担，假装上前去问路，那个家伙带理不理。小马趁其不备，对准他的后脑勺一扁担打过去，那个家伙就象一截烂木头，“咕咚”一声，应声倒在门边。其余的游击队员早已放下竹筐和柴担，夺门而入，几个箭步就冲到吴保长的堂屋里。这个坏蛋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这时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全家正围坐在八仙桌上吃团圆饭呢！游击队员大喝一声：“不许动！”吓得满桌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碗筷酒杯掉了一地，鸡鸭鱼汤溅了满身。一眨眼之间，那个吴保长转身没命地向屋后的碉堡逃，被游击队员一把揪住。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地磕头求饶。游击队员迅捷地收缴了他家的枪支，当场宣布他的罪状，立即就地枪决。并把事先写好的一张火布告贴在土围子的高墙上。过去群众唯恐在这阎王殿前多停一秒钟，生怕招惹飞来横祸。可是，这天群众站在这里不走了，不一会就围起一大群，人们的眼睛都盯在“中国工农红军赣粤边游击纵队军法处”的

大布告上。大家拍手称快，说：“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

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交手，以免陷入被动，遭受损失。但是，有些时候，或者是由于事先没有联系好，或者是由于时间没有算准，或者是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也常常要和敌人遭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立即分散，往大树林里、深草丛中、水坑里或乱石后边隐蔽起来。只要沉着坚定，敌人是不易搜到的。

可是，敌人也很狡猾。为了引诱我们出来，当官的就故意高喊口令：“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人马杂乱，象是真要开拔似的。其实，一个连的敌人，只走了个把排，三分之二的队伍，仍留在原地守候我们出来。我们也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就是不出来。往往一、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又沉不住气了。当官的跳出来一阵咒骂：“嗨，‘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吹哨子集合，果然带着队伍走了。但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这时，我们还在那里，草不动，树不摇。当官的可发火了：“妈的，有本事的出来干！”骂完了，机关枪、迫击炮往山上胡打一阵，一边打，一边又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再不，就弄个人假冒游击队员，说：“别打了，我讲，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游击队员也可能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咬紧牙关，忍住不哼。敌人施展种种诡计，胡搞一气，结果什么也捞不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我们从北山回油山的途中，突然与敌人遭遇。陈毅同志和他的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国民党的兵是怕死的，他们在明里，我们在暗里，他们不敢来搜索。因为搜不到还好，要是搜到了，怕我们二拇指一动，他们先得吃“黑枣”。他们才不愿

给当官的卖命呢！但是为了应付长官，有时还是不得不搜一下。搜的时候，扬着头，假意搜上两遍，便报告说没有发现。于是，连长喊排长，排长喊班长，班长喊士兵：“某某某，再搜一遍。”某某某虚应故事，又搜了一遍，说：“报告班长，没有。”班长说：“什么没有，我看到他们钻进去的。”某某某说：“光喊我，你自己怎么不去？”这时，那个排长就骂道：“你们滚开，我去。”排长下来看见一只鞋子，就说：“这里一定有人。”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同志盖得更严了。搜了一阵，他说：“妈的，跑掉了。”他把队伍带在路上抽烟。有的说：“倒霉，什么也没有捞到。”有的说：“老子搜到一个包袱。”他们把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有衬衫和书籍，便惊奇地说：“啊！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陈毅同志和特务员一直非常沉着，直到黄昏时分，敌人去远了才从芦苇中出来。

有一次，我和油山区委书记丁祖贻以及交通员、警卫员一行四人，从南雄大兰地区检查工作后回到驻地去。因连天阴雨，山间小路实在难走，就拣较大一点的路走。当我们转过一个山头的拐角时，发现距我们约百来米的地面，有一支南雄“铲共团”的队伍。警卫员眼尖手快，叭叭地打了两枪，就从斜刺里溜走，躲进荆棘丛中隐蔽起来。我随着枪声转身同老丁等招呼了一声，也火速跨过左边的围埂，钻进了深山密林。敌人鸣枪追赶。当我刚上山时，就听得树叶瑟瑟作响，原来敌人已窜到山脚。我就从山腰爬到山顶，钻进更加茂密的森林里，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当敌人追到山腰，因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没敢往更深的密林里追，只对山腰打了一阵乱枪，就灰溜溜地撤走了，就连隐蔽在他们脚跟边的警卫员也没有被发现。我们四个人走散后，却不约而同悄悄地摸回原来从大兰出发时的区委交通站。当我们重新会合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惜的是，警卫员在朝敌人打枪时，把我的那个旧阴丹士林布包和一只口缸，丢失在路边被敌人拾走了。当天下午，“铲共团”用枪刺挑

着我的那个旧阴丹士林布包和那只口缸，大摇大摆地从大兰走过。大兰的彭祖庭同志，过去在红军队伍里干过几天会计工作，对红军游击队的感情特别深厚，同我更是十分亲近，他见到敌人枪刺上挑着我的那个布包和那只口缸，却不见我的影子，暗地里为我的安全捏一把汗。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们重新见面时，他惊喜地说：“天啦！我还以为你牺牲了。”

四

在反“清剿”中，男女秘密交通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了保证出敌不意，夺取战斗的胜利，为了避免游击队因情况不明、行动失误而受损失，秘密交通员们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雨暴风狂，不避艰难险阻，奔波在高山密林间，来往于敌人的碉堡群中，英勇机智地传递着党的指示、机密情报和战斗信息。

信丰上乐的共产党员郭洪传，就是许许多多优秀交通员中的一个。他工作出色，经验丰富，并善于随机应变。有一次，他带着一份机密文件，从上乐送到坑口去，然后从那里带着项英、陈毅同志的回信，经宰子坑返回上乐。在返回途中，他来到下坊屋场，环顾四周，见没有什么动静，便在一家老表的门口，坐下来歇气。刚刚抽完一筒烟，就有人对着他呼唤起来：“老表，兵来了。”郭洪传马上站起来，挟着雨伞就走。他拐到屋场背后，见小河边有个钓鱼的小孩，正爬到果树上去摘果子，把钓竿丢在河边。郭洪传灵机一动，火速地跑过去，把文件和雨伞藏在深草沟里，拾起钓竿，悠悠然地钓起鱼来。反动派军队窜到屋场来了，东窥西望，对着郭洪传大声喊叫：“喂！见到一个撑伞的人没有？”郭洪传头也不回，慢吞吞地回答：“有一个。刚过去了。”爬在果树上的那个小孩，马上接嘴说：“看，那个人正在对面那座山上奔跑呢！”敌人听了，连忙追了过去，郭洪传迅速地从深草丛中取出信件和雨伞，拐进另一条小路，回到了交

通站。原来，当郭洪传撑着雨伞在秃岭上行走时，山下的敌人早已从望远镜里发现了他。随后，敌人就跟踪前来。可是，狡猾的敌人最后还是扑了个空。事后项英同志赞扬了郭洪传同志的英勇机智，并亲切地对他说：“洪传，当交通员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能有半点疏忽啊！”洪传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工作更加小心谨慎。

还有一次，被派到信康赣区工作的曾纪才同志，与一个秘密交通员一道，到一个地方去联系工作。不巧，他们和国民党士兵遭遇了，就连忙躲进路边的草丛里。敌人拚命地搜索，眼看就要搜到他们身边了，那交通员就对曾纪才同志说：“今天是躲不过了，我们两人只好牺牲一个。你是负责干部，应当赶紧走，由我出去把敌人引开。”曾纪才同志还没有来得及答话，那个交通员已勇敢地站出来，迎着敌人走去，说：“不要搜了，我在这里。”敌人问他还有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什么地方，他用手指了指，说：“在东边，我带你们去。”他把敌人引开之后，曾纪才同志乘机脱了身。后来敌人发现上了当，就狠命地打他。他说：“再打也没有用，人家早跑远，你们抓不着了。”这个交通员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这种“把死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的战友”的风格，何等崇高！

但是，在交通员中也有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一旦陷入敌手，就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了，还带着敌人来搜捕自己的战友。这种为虎作伥的勾当，给秘密交通线带来极大的威胁，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为了谨防叛徒的破坏，领导上经常教育交通员要格外保持警惕，严格遵守秘密交通纪律和各项制度的规定。一旦交通员误期不归，领导上马上改变活动方式。有时指挥机关还要立刻转移，正如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指出的那样：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
交通晨出无消息，

屈指归来已误期。

立即就迁居。

五

敌人在“清剿”中，为了寻找红军游击队，曾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他们常常派出便衣侦探，装扮为打猎的、采香菇的、烧炭的、砍柴的和挖竹笋的，窜到山里探听动静。他们在路旁沟边察看有无我们的足迹，到山顶上观察有无我们烧饭的火烟；躲在山林草丛窃听有无我们说话或咳嗽的声音。他们一发现“情况”，马上向上级报告，调来军队，把我们包围起来。

敌人的这些作法，使我们的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我们也有一套反“清剿”的办法。“有路不走，没路就走”，一般不走公路、大路，而是设法穿插过去；有时就连小路也不走，专找无路的山爬，不管山高坡陡，总是奋勇地翻越过去，以免留下脚印，暴露目标。特别是下雨天，为了走路不留脚印，我们干脆在水沟里走。在水沟里走时，决不能失落东西。否则，失落的東西顺流而下，敌人发现了，又会跟踪而来。至于行军必经之路，后面专门有人处理脚印。晚上走路，不点火把，不打手电筒。为了不致走散，有时每人头上扎一条白手巾，一个紧跟一个走。煮饭时，尽量做到“白天做饭不冒烟，夜里烧火不透光”。还严格规定行军不许大声说话，不得大声咳嗽。记得有几个同志，嗓子粗，说话的声音稍大一点，有的又爱开玩笑。陈毅同志就告诫我们：

休玩笑，耳语音放低。

林外难免无敌探，

前回咳嗽泄军机。

纠偏要心虚。

当然，我们有时也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例如，走路倒穿鞋子，故意留下“脚印”，让敌人跟“踪”寻找。到离我们驻地较远的山上点火，让敌人来“围剿”。有时故意在野草丛中丢锅，把“目标”暴露给敌人，让敌人在深山里捉迷藏。

根据斗争的实践，项英、陈毅同志后来还提出了几条游击队的《秘密原则》和《行军规则》。

《秘密原则》是：（一）生火做饭不出烟，以免被敌人发现。（二）不出响声，说话小声。（三）进出不留脚印，走小路，走荒地，走水沟。（四）无直接工作关系绝对不往来。

《行军守则》是：（一）选择好时间，不任意行动。（二）行军时爬山走荒地，以免中敌埋伏。（三）过山坳要从旁山爬过。（四）随时注意路上所发现的各种迹象，以判断敌情。（五）夜间行军要一个紧跟一个，以免失去联络，绝对禁止打电筒。（六）行军间隔要短，与尖兵距离须在十米以外，以便发现敌情及时应付。（七）行军时绝对禁止高声说话。（八）不脱衣睡觉，时时捆好衣物，如有情况好迅速行动。

六

在反“清剿”斗争的那些艰苦日子里，项英、陈毅同志常常深入到北山、油山、信丰、南雄等地，听取游击队和党的组织的汇报，及时指导斗争。

一九三五年六月，陈毅同志腿上的伤口复发了，不能行走。当时药品的补给极为困难，八卦丹、万金油、仁丹、济公水，算是最好的药品了。他就在伤口上擦点万金油，用块布包扎，不久倒也好些。

谁知到了九月，伤口再次复发。这一次痛得更加厉害，伤口已经化脓，腿跟红肿。但他不顾伤痛，仍坚持到南雄参加县委召开的

紧急会议。一路上，他拄着拐棍，一跛一跛，步履极为艰难，特别是爬山越岭的时候，更痛的难受。天近黄昏的时候，好不容易走到了县委住的棚子。他趁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就在县委棚子东南角的杉树林里挤伤口。起初，让警卫员帮他挤。警卫员见他脸色变得象一张蜡纸，汗珠直往下滚，怎么也不忍用劲去挤。陈毅同志就说：“为什么不用劲啊！”警卫员说：“我用力你要抖嘛！”陈毅同志说：“那好，你去拿根带子来，我把腿子绑在树上，挤的时候就不会抖了。”警卫员找来了带子，陈毅同志坐在两棵杉树当中，把伤口复发的腿横绑在树干上，背脊靠在另一棵树上，警卫员两手紧按伤口，小心翼翼地挤着，血水沿着伤口一股一股地向外流，终于把脓血挤干，连负伤时碎在里面的一小块骨头也挤了出来。接着，警卫员帮他用盐水把伤口洗净，用万金油抹在用盐水煮过的布上，再用竹签子把它一点一点地塞进伤口里去。最后，在伤口外面用块布包扎起来，就算处理好了。警卫员见他浑身颤抖，脸上的汗珠再一次沁了出来，吓得连看也不敢看，而陈毅同志却谈笑自若，说：“这次挤干净，下次伤口就不会‘反攻’了。”果然，从这以后，他的伤口居然渐渐好了起来，而且再没有发过。

敌人“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只好把期限从三个月展为半年，以后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在我们红军游击队方面，却在反“清剿”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项英、陈毅同志曾把这些经验概括为这样一些基本原则，即：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而是“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在这些原则指导下，坚持公开斗争与半公开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地下党

的内线工作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在武装斗争中，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的灵活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而我们处处主动；善于运用夜袭的战术，努力做到把敌人搞掉，而我们一个不伤；利用地形地物打伏击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后来，随着游击战争的持久开展，各个游击队在游击战术的运用上，更是达到了“最精彩的阶段”。为了便于一般不识字的同志记忆，项英、陈毅同志还把这些游击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仗，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中，对这些游击战术，进一步作了具体的形象的概括：

讲战术，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第七章 扎根

一

严寒的冬季来到了，红军游击队的处境更加艰险了。

一九三六年初，我和油山区委的几个同志，到彭坑、黄种一带开辟工作。根据项英、陈毅同志关于“巩固老游击区，发展新游击区”的指示，我们和当地群众一样的装扮，蓝衣裳，黑头巾，避开大路，穿过山崖小涧，来到了那里。

彭坑、黄种地区，在油山西北方向。拨开油山的云雾北望，目光掠过群山之巅，可以看到一线平原，曲折的漳水，时隐时现地从大余流来，绕过青龙、池江、新城，向赣州方向流去。冬季的南方平原，绿一块，红一块，黄一块，直到与云雾缭绕的崇义、上犹山区连接。我们看到这样开阔肥沃的平原，不禁赞美道：“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欺骗宣传，以及我当地党组织过去执行错误政策的影响，至今在赤白交界地区，山里山外的人还存在着对立的情绪。山里的人外出很麻烦，山外的人进坑，没有保人也不会顺利。而这条山沟，这时只有有数的几户人家，离敌人又近。反动军队驻扎在圩里，那些当官的只要心血来潮，口哨一吹，一个跑步就可以到山沟来搜个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活动不便，物资补给尤为困难，要立脚、发展，并不是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做到细致、周密、坚定和灵活。

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召开了干部会议。那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和廖正文、吕新洪、陈妹子、曹秀清等

同志，秘密地挤在葵花坑的茅棚里。茅棚四周全是枯藤荒草，杳无人迹。我们拟订了一个工作方案，确定：第一，巩固立足点；第二，建立贫农团，依靠贫雇农，做好赤白交界地区的群众工作；第三，发展大墩（平原）的工作。

我对大家说：我们的工作要象钉钉子一样，一步一步地钉牢在这一带，深深地扎下根子，把赤白交界区变为赤区，把工作推向平原。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红军的群众纪律，努力消除赤区的人民与白区的人民之间的隔阂。敌人非常残暴，动不动就是一番烧杀，加上欺骗宣传，不少人暂时会迷失方向。我们应该理解和体谅人民群众在这种严重情况下的困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从事革命斗争。

我的话音刚落，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长曹秀清同志说：“对！我完全拥护！过去左的那一套，给我们吃的苦头，已经够了。现在我们就按照新的政策来干吧！”他把手一挥，指着山下说：“就拿彭坑来说，刘汉光是忠实可靠的；他的妻子三婣子经常给我们送饭。还有魏良洪，是红军伤员，现在还被关在大余监狱里。我们要马上设法把他保出来，使他成为我们依靠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串连发动，着手建立贫农团。”接着，大家都发了言，提了建议；最后，分头奔向彭坑和各个屋场（村庄）去了。

二

在群山环抱、密林遮天的彭坑沟边，有所单门独户的房子，就是刘汉光的家。我们把他的家当作“立足点”，他们全家则把我们当作亲人。刘汉光的妻子三婣子三十多岁，已是八个儿女的母亲。她为人忠厚，又很能干，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除担负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外，她还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我们请她办的事，她都

努力去办。

记得有一次，游击大队长曾彪同志隐藏在彭坑对面的小山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兵就在彭坑的沟边放哨，监视很严。三娣嫂想，曾彪同志在山上已有好几餐没有吃上饭。怎样才能避过敌人的眼睛，把饭菜送过去呢？她想了好久，最后决定把饭菜放在一个竹筒里，再把竹筒放在背篓里，上面放一把镰刀。她背上背篓，扮作上山去砍柴的样子。当到达小山脚下，相机与曾彪同志取得联系。曾彪用一根藤子束在腰上，装作砍柴的样子，看看左右无人的时候，挨近竹篓，取走了竹筒。接连几天，她坚持这样给曾彪同志送饭，做的很小心，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有一段时间，陈毅同志和我住在三娣嫂家后山上的草棚里。三娣嫂每天总是提个竹篮子，借口上山打猪草，把油、盐、菜、米送到草棚来。端午节那天，三娣嫂还提着一篮粽子送给陈毅同志吃。陈毅同志看着这些充满革命情谊的粽子，非常激动，亲切地问她：“表嫂，你叫什么大号呀？”

“我姓周，妇娘们没有大号，小名叫三娣子。”她回答说。

“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也该有个名字啊？”陈毅同志风趣地说。

“好是好，只是我没文化。你给我起个名字吧！”她说。

“这样好吧，你天天给我们送饭、买东西，手里少不了一个篮子，就叫周篮吧！”陈毅同志想了一想，爽朗地笑道。

大家赞同这个名字，认为很有纪念意义，周篮自己也很满意她的新名字。

一天，陈毅同志坐在周篮家屋后的石板上看书，警卫员宋生发和聋牯坐在旁边擦枪。突然，周篮家的狗狂叫起来，原来是一群国民党兵窜到彭坑来了。这时，周篮嫂正在门前河沟洗东西，发现敌人时，要赶回屋后通知陈毅同志，已来不及了。她急中生智，用石

头打狗，边打边大声叱骂：“你这只死狗，叫什么？这么多兵来了，会一下子把你打死的。”陈毅等同志听了，连忙转移到深山里去。敌人搜查了周篮的家，但什么也没有捞着，就溜回去了。事后陈毅同志感激地说：“大嫂，你真有法子。”

我们在彭坑后山的草棚子住时，有事常要找刘汉光，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常来搜山。我们白天去他家吧，怕暴露目标，晚上去呢，又怕他家的狗叫。外加他们住房外面还有一堵土围墙，叫门也不方便。后来这个情况被周篮知道了。一天早上，她又提着只篮子，送东西到我们的棚子来，还跟来一条狗。狗见了生人，夹着尾巴唔唔地叫。周篮嫂对游击队员肖明朗同志说：“你们拿点东西给它吃吧，以后它就认得你们了。晚上你们来也方便。”接着，她又说：“每天晚上我关门的时候在土围墙的墙脚放一条凳子，你们可以踩着凳子翻墙过来，就不会惊动别人。”我们照着她讲的做，联系工作就比较方便了。

周篮同志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一直铭记在心。一九六二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时，陈毅同志在看望参加会议的大余县委书记时，问起彭坑的周篮还在不在？县委书记回去，果然找到了周篮，并表彰了她在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支援红军游击队的功绩。后来，周篮同志以老苏区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议，路过上海时，我也和她高兴地见了面，亲切地交谈了很久。一九七五年她去世时，我特地给她送了花圈，对她表示深切的哀悼。

三

我们有了这样的落脚点，就开始组建贫农团。当时参加贫农团，被反动派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可是，只要我们工作做到的地方，不管有多么大的危险，总会有人参加。

一九三六年初春的一天，油山中心区委在蛇子坑的棚子里筹

备圪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这是紧接着小汾贫农团成立后的又一个盛会，它表明这时我们的工作已经向山外展开，并已伸展到平原的边缘。这一天，据了解没有敌情，大家一早起来就忙着布置警戒，愉快地生火，安排“会场”。

我们正忙着，忽然听到山鸡叫了，叫声由远而近。这是信号，有人来了。廖正文连忙向我招呼一声：“来啦！”

我隐蔽到石咀后面，透过树丛往山下一看，果然有一个人，挑着一副空柴担，缠着黑头巾，穿着一件大棉袄，这件棉袄几乎吐满黄呼呼的棉絮，也不知传过几辈人了。这人大约十六、七岁，样子很机灵。他在坑口左看看，右看看，两手抓住柴担，猛一窜进了林子，躲躲闪闪地向我们山上奔来。在他身后，并没有拖着国民党的“尾巴”。

他上来后，我就招呼他：“黄克连，你早哇！从兰村来吗？”

他抬头看见我，惊喜地答道：“阿丕老陈，你更早哩。你还记得我住在兰村？”他摘下头巾，头上热气腾腾。

“怎么不记得？头年你进坑割晚禾的时候，克廷不是介绍过吗？”

“对，对！从那以后，同志们还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哩！昨天晚上通知我开会，我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今天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生怕误了大事。”

人来多了。克廷、克连、克纪、克扶、克轮和传仕等，几乎全是姓黄的，一共十几个人。人一多，冷僻的山坑顿时热闹起来，到这里来开会是不容易的，每道封锁线上，国民党都贴着命令、布告，白纸上写着黑字：“通匪、济匪、窝匪者，杀无赦！”但是，觉醒的农民，为了寻找自己的组织，为了闹翻身，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回答反动派“杀头”、“满门抄斩”威胁的是：“来吧，摘下脑壳也要把你们砸碎！”于是，有的背着筐子，有的挑着柴担，三三两两地登上山来。

人到齐了，我对廖正文说：“找几个同志帮他们打柴吧，等他们开完会，好下山。”

几个游击队员应声拥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柴担、柴筐搬着就走，来开会的人急忙起身阻止，双方互相友爱地争执起来。我说：“打几担柴禾算得了什么，这不也是应该的吗？要不，大家空着担子下山，反动派盘查起来，怎么回答？”他们才没有话讲，围着炭火坐了下来。

这时，曹秀清向我示意，岗哨没有发现敌情。

圪里贫农团的成立大会就这样开起来了。在这个会上，许多人都激动地倾谈自己的认识，表示决心：决不反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和地主豪绅阶级斗争到底。气氛是那么肃穆庄严，每一个人的每一句话，都象山盟海誓，激动人心！他们站立起来，象漫山的青松翠竹，敢傲雪霜！

贫农团成立了，黄克廷当选为负责人。选举后，我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参加了自己的组织，要努力工作。“天下穷人是一家”，大家都有责任向贫苦农民宣传，介绍好的对象加入组织，人多，力量就大了。工作要秘密，不能暴露。发展对象要谨慎，好吃懒做的不要，二流子不要，土豪劣绅更不要；要贫苦、勤劳、有觉悟的人。对于那些来自外地的“客户”，不能歧视，要团结帮助。并且告诉大家，运用多种多样活动的方式，交朋友，结同庚，或者通过宗族关系、社会关系广泛地团结群众，一起战斗。

散会的时候，大家挑起了游击队员打好的柴禾，兴致勃勃地挑下山去。他们下山坡，过小桥，有说有笑，十几个人一行，柴禾沉甸甸，扁担闪悠悠，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快步如飞。他们挑着、背着柴禾，心里惦记着自己的誓言，将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带回各自的屋场，使它在群众中传播，让革命的火苗在平原上燃烧。

四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廖正文突然叫醒了我。他说：黄克连找好了一个对象，约定明天进山打柴。

看来这似乎是一桩小事，但是在当时，我们把它看成是打破敌人封锁、创造生存条件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争取一个对象，我们不遗余力地工作。因此，当晚我们作了周密的布置。

黄克连约好的对象是兰村的老邓。他是从南康搬来的“客户”，到兰村后，人生地不熟，家又穷，一天到晚没着没落的。黄克连看中他是个老实人，先跟他打招呼。以后，在谈吐中不时流露对他的关怀与同情，话很投机。后来，两人议论起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来，老邓说：“共产党好是好，就是没有路子，弄不好要出事的。”黄克连说：“我也想联系。我想只要认识清楚了，总会有路子的。”分手的时候，两人约定第二天一同进山打柴。随后黄克连就给我们带来了信，希望我们接头考察。我们也认真地研究了这种情况，作了布置。

第二天一早，黄种的山坑里来了两个人，一大一小，一前一后，都挑着担子。小个子的一举一动，早已使游击队员认出了他就是黄克连。他们一进入山林，游击队员和区委干部就出来和他们见面，攀谈，并且帮助他们打柴。从谈话中了解到老邓确是一个好对象，与黄克连所谈的基本上一致，区委干部暗中向黄克连点点头。不久，天下起雨来，游击队员赶紧给他俩把柴捆好，并且送给每人一件蓑衣，对他们说：“雨大了，下山吧！”

老邓已经觉察到这就是自己一心想找的红军游击队，挑起担子来的时候，眼角里闪着感激的泪光，好象有满腔的话要向我们倾吐。

过了一些日子，贫农团又开会了，会场里增加了几个新会员，

其中一个就是老邓。

五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遵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在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对贴“反共”标语应付敌人的群众，不予追究。对个别反水的农民，采取宽大的教育政策，除造成很大危害的以外，一般就让他们回家生产；万不得已需要镇压的，对他们的家属也酌情给予抚恤。

政策上的调整，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说：“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真是顺天理，合人情，仁至义尽啊！”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使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被迫搬出山坑的群众纷纷回来，坑里的人多了，贫农团的发展就快，不久好几个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每人每月还交三、五个铜板的团费，表示对组织的忠诚和爱护。他们知道山上粮食困难，秘密开会作出决定，把坞里的二十五石公堂赈谷打成米，通知游击队员夜里去挑；他们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割断敌人电线，勇敢地参与了火热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把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团，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党、团组织，把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渐渐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

以后，整个斗争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在这一年的重阳时节，我们进一步发展大墩（平原）工作。在大洋坑举行集会，检阅了自己的队伍。

这时，晚稻已经开镰收割，但漫山的松杉依然是那么苍翠。一天早晨，游击队员们穿过茫茫重雾，下到屋场，布下了隐蔽的岗哨，并且宰掉了买来的一只大白鹅，回到山坑，大家把鹅肉放到盆里炖起来，等待着来到这里集会的人们。

不久，彭坑、黄种、小汾、平田坳、坞里、兰村，还有板棚下、露箕

坑的人，陆续来到山坑。有的从大路上来，有的是从山砭上来，有的从林子里穿过来，方圆数十里的人，聚会在一起，汇报了情况，研究了工作。最后决定，彭坑、小汾、平田坳、圪里各成立一个贫农团。蓝玉辉老伯被推选为小汾贫农团的负责人。黄克廷为圪里贫农团负责人。其他各贫农团都推定了适当的人负责。黄克连则负责杨村、兰村一带的工作。

散会了，将锅盖揭开，喷香喷香的美味就冒了出来。我们把炖好的鹅肉端上来，大家围坐在一起聚餐，迎接革命转折点的到来。

第八章 反搜山

一

一九三六年春天，正当反“清剿”、反封锁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获得敌人的密令：“要组织一万民众，自带柴刀、火柴和七天的口粮，随军搜剿。违抗命令者，以通匪论罪，格杀勿论。”

陈毅同志当即和我们一起，对这个“密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是在游击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回山斗争，使敌人的阴谋破产后，敌人施展的一个新花招，目的是把油山变成秃山，使游击队无处藏身，从而断绝革命的根苗。

随后，陈毅同志又到项英同志的驻地，共同分析了敌人内部的矛盾，认为大余、信丰和南康的敌人，不属同一建制：大余是余汉谋的第一师；信丰是余汉谋的第二师；南康是保安队。他们之间不可能协同动作。

针对这些情况，项英和陈毅同志作出决定：

把信丰境内的几个指挥机关，分散到大余、南康境内暂时隐蔽，并把游击队住的棚子拆掉，以消灭目标；

在敌人开始搜山抄山时，游击队主力乘机挺进山外，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后方，迫使敌人出山；

发动被迫进山“搜剿”的群众，故意拖延时间，使敌人不能按计划进行；在搜山时，由党员发动群众大声吆喝，示意游击队迅速转移；

再发动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在山外割电线，打冷枪，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吸引敌人出山；

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向国民党保甲长发出警告。

不几天，粤军余汉谋果然要大余、信丰、南康的群众，分路大举搜山，每路前有群众二、三百人，后有敌军一个连，从四面八方游击队的驻地搜抄。

当拉成“一”字形长蛇阵的人群，缓缓地向前蠕动时，我们在山里，远远就可以听到“杭唷！杭唷！”的歌声，那是群众示意游击队，反动派来搜山了。

当敌人用枪刺威迫群众砍树时，群众故意拖延时间。当着敌人的面，用刀口砍两下；敌人一走开，就用刀背砍。结果是砍树声怪响，一天却砍不倒几棵树。

敌人认为可疑的山窝子，就站在上面要群众带着鸟枪、梭标下窝子搜。可是，搜来搜去，却没有搜出一个游击队员。

在信丰的上乐地区，敌人要搜山群众到对面山上烧茅草。这一手是很毒辣的，因为茅草一烧，火势蔓延，酿成大火，就会毁坏大片山林，把游击队烧死在里面。

为了对付敌人，群众队伍中走出两个人，一个是大小窝党支部书记老郭，一个是共青团员小肖。他们表示愿意带领敌人去烧山。

到对面山上去，必须越过一条河沟。河沟没有桥，只有几块石头，散乱地露出水面。当他俩过河时，故意把身子一歪，跌倒在河沟里，并趁跟在身边的两个敌人没有提防，顺势把他们的右腿一钩，左手一拉，就拉下了水。另外两个敌人，也被水浪溅了个一身湿。敌人恶狠狠地把他俩骂了一阵，要他俩继续在前带路。

到达茅草山时，他俩掏出火柴盒一看，火柴全都浸湿了，根本擦不着。于是，敌人只好把自己身上的火柴掏出来，但他们的火柴也是湿的，哪里擦得着。气得敌人大骂：“混蛋，滚回去！”

傍晚，敌人缩回乌龟壳里去了。半夜里，群众中的游击小组就活跃起来了。他们带着刀具，跑到电线杆下，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

的肩膀，把几十公尺长的电线割下来，丢到深山里，或沉到水塘里。然后，在电线杆上贴上游击队的标语。第二天，敌人出来查看时，群众说：“昨晚狗咬得凶，可能是游击队下山来过。”敌人看到电线杆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士兵不打士兵！”落款是“红军游击队第××支队第×大队。”敌兵装着没有看见一样，连忙缩了回去。

就在上乐地区敌人开始烧山搜山的当天晚上，上乐游击队政委吴汉财同志率领游击队员，急行军八十里，深入到敌人后方的信丰犀牛一带。他们白天隐蔽在密林里，晚上出来放冷枪，贴标语，打乡公所，抓土豪。群众游击小组则配合他们割电线，造声势，在洋油箱里放鞭炮，纷纷传说来了游击队。游击队则从犀牛、牛颈，一直游到龙回、大龙，闹得敌人晕头转向，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游击队。那些土豪劣绅被吓得纷纷到县城躲避。

在敌人发起搜山的第三天，被裹胁到山里的群众就跟敌人闹：“你们要我们来搜山，游击队却搜到我们家里去了。我们不搜了，要回去保家。”敌人士兵在山里，日晒雨淋，夜里更被蚊子咬得苦，怨天尤人，骂道：“搜山，搜山，搜他妈的，连个‘土匪’的影子都不见！”敌人生怕游击队端掉他们的老窝，便提前把部队调出山，把被他们胁迫进山的群众解散。

敌人出山，游击队回山。

敌人苦心经营的“大搜山”，闹腾了几天，什么也没有捞着，只好草草收场。

二

敌人的这次“大搜山”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敌人始终没有放弃采用移民、并村、搜山等手段来困死扼杀游击队。因此，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在给养上所遇到的困难，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在那种情况下生存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游击队只有为数不多的步枪，而且多是“单响枪”，不是没有“爪子钩”，就是没有“顶子簧”，打了一枪，子弹壳退不出来，要用通条捅了以后，才能打第二枪。

到敌人后方去执行任务，一般说短枪是不可少的。但是，那时要弄到支短枪，是多么难啊！我们有时只好把长枪的枪柄锯短，别在长袍和上衣里面，当短枪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主要靠打伏击战，从敌人手里缴获枪支弹药，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同时，也靠打土豪，迫使土豪为我们购买枪支弹药。另外，我们还发动群众到敌人那里去“偷”。但往往“偷”到了枪，却“偷”不到子弹。所以，我们每支枪配备的子弹很少，一般只有三、五发。

吃饭的困难更大。特别是在敌人“清剿”、“搜山”最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大家只好用野菜充饥。

有一次，陈毅同志与敌人猝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也被打散了。他一个人在茅草从里躲了三天，挨了三天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老表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咀嚼。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了，想到沟边取水也没有力气了，只好静静地躺着。幸亏第三天，我们在山里找到了他。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炊事员和游击队员们还想出了种种巧妙的办法来做饭。拣枯枝，劈细柴，白天烧火不出烟。夜晚烧火的时候，上下左右都围以军毯，不透火光。有时，没有锅做饭，大家就地取材，从山上取来一截竹筒，捅开竹节，装进米和水，用泥巴封住两头，横放在火堆中，等到竹筒将要燃着时，劈开竹筒就是熟饭。正是：“一根竹子大叉长，捅开竹节把米装；烤上一堆闷星火，掏出米饭喷喷香。”

我们经常吃不上菜，有时能吃上点广东海带、咸鱼和萝卜干，就算很不错了。不过，情况不太紧张时，我们也积极想办法“改善

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上好吃的东西多着呢！油山有杨梅、竹笋，都可以吃。北山有一种叫作“挪”的山果，类似香蕉，又香又甜，既能解渴，还可充饥。北山、梅山有一种名叫石鸡的山田鸡，大的一只有斤把重，也是改善生活的美味。情况好些时，我们夜里出去捉蛇和石鸡。火光一闪，蛇就缩作一团，很好捉。电筒一亮，石鸡就跳到亮处来，一动也不动，一捉一大篓。这种山田鸡，可以炒了吃，也可以做汤吃，汤白得象牛奶，味道很鲜。我们有时还出去掏马蜂窝，掏蜂蛹吃。在大树林里，马蜂很多。但掏的时候，老蜂要来叮。我们就用竹筐套在头上护着，然后点着干草，对准蜂窝口熏，老蜂子被火烧死或者飞走，我们就把里面的蜂蛹掏出来，炒了吃，又香又脆。山上还有山牛、山羊、野猪、豹子、老虎等各种野生动物。要是能打上只野猪和山羊、山牛，那就太好了。可惜有时因怕打枪暴露了目标，即使它们来到身边，我们也不敢开枪，只好同它们“和平共处”。

每当我想起这段生活时，陈毅同志那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诗句，便在我的耳际回旋：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初到油山时，我们还可以在偏僻的地方找些小房子住，后来房子被敌人烧掉了，有一段时间，就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地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坟的石板一躺，仰卧着看星星月亮，与天地同归了。

赣南一开春就是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靠把伞撑着，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简直无法入睡。特别是深山密林，春寒长，秋凉早，夏天也往往是夜凉如水，露浸肤寒，冷得人被冷醒。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用明白如话，饶有风趣的诗的语言，再现了我们当时的情景：

天将晓，队员醒来早。
露侵衣被夏犹寒，
树间唧唧鸣知了。
满身沾野草。

遇到雨季，困难更甚。他还写着：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
野营已自无篷帐，
大树遮身待晓明。
几番梦不成。

在情况较为稳定的时候，为了不在大树底下撑把伞过夜，大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己动手搭棚子。有时是用芒杆搭成“人”字形的棚子住，有时又搭成竹棚、杉皮棚和布棚。我们用竹子搭棚时，先把竹子剖成两半，然后在棚顶上把竹子一根根排列起来，就象一排排“玻璃瓦”。可是由于剖竹子时，响声很大，容易被敌人听

见，便改用杉树皮搭棚。但是，杉树剥皮以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大家又想出了新办法：发给每人一块蓝布，蓝布的四角钉上绊子，往四周树上一挂，便可遮露挡雨，搬起来也方便，只要把蓝布一解，把地扫干净就行。游击队每个班都有一把杓，搬家时只要用杓泼水，就可以消灭地上的痕迹。当然，遇有山洞的地方，我们就在洞里过夜。

一九三五年冬，赣南下了一场几十年未有过的大雪，树枝上、茅草上，到处挂着一串串冰棱，粗得象一根根冰棍。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的碰断了，就“哗——嗞——”一直溜到山下。突围上油山时，我的背包和衣服都丢光了。到达油山后，要添点衣服，也难以办到。有一年，我就只穿一件夹背心，两条短裤，度过了寒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子盖。那年冬天，我就和杨尚奎同志合盖一床薄薄的毯子。你拉过来，我拉过去，怎么也盖不严。那凛冽的寒风，钻进了棚子，我们翻来覆去，浑身象打摆子似的，一刻不停地打颤，上下牙齿碰击得又酸又痛。我们就这样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无数的风雪之夜。

那个时候，“风击悬冰碎万瓶，野营人对雪光横”（陈毅诗《雪中野营闻警》），不能说是不难；“恶风暴雨住无家，日日野营转战车”（陈毅诗《野营》），不能说是不苦；日搜夜剿“满山抄”，不能说是不险。但是，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亲密无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游击战士，从不叫苦。不论是在杳无人烟的深山里，还是在昏暗潮湿的森林中，不论是遇到狂风暴雨的袭击，还是遭受饥寒交迫的冻馁，大家总是谈笑风生，乐趣融融。而且只要情况许可，大家就小声唱起红军歌曲、新山歌和赣南采茶调来。特别是陈毅同志，更是胸怀坦荡，泰然处之。他当时写下的那些诗篇，充分地反映了他那镇定自若、坚毅顽强的高昂革命斗志，对革命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

三

在粉碎敌人搜山封坑的斗争中，我们游击队员固然能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困难；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我们游击队员对党始终怀有坚强的信念，并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冬，下了那场大雪之后，我们被困在深山里，与山外群众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粮食已经吃光，野菜也没法寻找，大家都在发愁。

正在这时，指挥机关派出去搞给养的事务长回来了。他历尽艰险带回来一布袋的大米和干菜，真是使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当他从布袋里往外掏大米和干菜时，他还喜冲冲地说：“不用发愁了。山林里到处有小仓库，要米有米，要盐有盐，老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大家听了都跑进树林里去找“仓库”。警卫员叶树林找到一根作了记号的竹杠子，拉开杠头的塞子，果然淌出了白花花的米。交通员郭洪传扒开小土堆，取出一只陶瓷缸子，揭开盖子，香气扑鼻，原来是黄橙橙的茶油。当炊事员老黄找到了一缸子盐时，警卫员聋牯又叫了起来：“呵，辣椒、萝卜，还有咸鱼、牛肉干巴呢！”

这些粮、油、菜、盐是哪里来的呢？后来了解，是这么一回事。随着移民并村搬到山外去的群众，同游击队联系不上，也非常着急，就到敌人那里去闹，说我们从山里搬了出来，在山外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让我们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就不得不答应群众进山。除了在初一、十五“开禁日”，允许群众自由上山打柴外，平日也只好派出队伍押着群众进山。群众就趁机把干粮、食盐、干辣椒、咸鱼、腊肉、报纸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带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

这个办法，渐渐地被敌人发觉了，敌人对进山群众搜查很严。于是群众又想出了新的办法，他们把挑柴的竹杠的竹节打通，里面装上米、盐和其他食物，然后把这根竹杠丢在山上，下山时另砍一根竹子当竹杠，挑柴回去。

这个办法，又被敌人知道了。狡猾的敌人就躲在群众打过柴的地方，伏击游击队。我们吃过亏后，也就特别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在山里的办法来诱使我们上当，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了几天，敌人看看他们丢的东西还在，以为这山没有游击队了，就不来搜山，我们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要是偶尔山上的老虎把敌人丢在那里的东西吃掉，游击队反而非赶紧转移不可。

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粮食，送干菜，而且想方设法为我们送情报，作掩护。

有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一个庄子，挨门挨户地清查，随便捕人。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以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而遭殃的人也更多。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吐半句真情，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有的儿子被捕了，母亲就给国民党连长送老母鸡，连长收下老母鸡，在母亲身上踢一脚：“滚你妈的。”母亲倚在门坎上哭，哭得连长不耐烦了，骂一句：“他妈的，去，劝劝你的儿子。”儿子被吊在屋梁上，早已被打得半死。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对儿子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道好歹，千万别乱讲。”那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也就心里明白，更加坚定了。

有时，敌人对靠近山区在他们看来是“最不可靠”的庄子，采用

“欲擒故纵”法。在那些庄子里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却故意不驻一个兵，也不来清查户口。过了几个月，他以为游击队麻痹了，不再警惕了，就突然把那些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这时群众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庄前庄后，庄里庄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约定的暗号。比如，敌人见到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就喝问：“‘土匪’在哪里？”群众说：“不知道。”敌人说：“回去！”群众说：“回去就回去。”群众随手把赶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到了夜晚，群众放哨，也和我们约好了口令。如果国民党的兵来了，答不对我们的口令，群众就故意一面叫喊：“‘土匪’来了！”一面就向他们放土炮、鸟枪。如果国民党要群众带路“搜剿”游击队，群众就故意带错方向。

有时，狡黠的敌人故意蓄着长发，留着长胡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装成游击队员或红军伤兵，在游击队驻地附近或赤白交界区，深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同志，同志，请开门，我是打散的游击队，讲讲阶级友爱，弄点饭吃吃……。”老百姓要是答了话，开了门，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不过，那时，群众的警惕性也很高。对陌生人叫门，固然不答应；就是很熟的人，夜里也不随便开门。只有听出口音，听出是自己人才开门。

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敌人装扮成游击队，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王老头家喊门。斗争经验丰富的王老头，一听装模作样的喊门声，心里便有底了。他根本不理睬。那些家伙死命地叫了一气，不见开门，就使劲把门打开，擅自闯进屋里来了。他们见了好吃的东西，就拿来吃，边吃边说什么他们是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好容易才来到这里的。

王老头见这光景，心里完全明白了。于是，他就咒骂起来：“你

们是‘土匪’，快给我滚开。要不，我就要去报告国军了。”那些家伙装模作样地说：“不，不！别误会。我们真的是红军。”王老头听了，骂得更凶了。他老婆拿起扫帚，警告那些家伙：“你们快给我滚！再不走，我就要把你们赶出门了。”

厚颜无耻的敌人，挨了一顿臭骂之后，竟窃窃私语，哈哈大笑，还伸出大拇指，连声称赞说：“你们呱呱叫，呱呱叫！……”随后，象狗一样夹着尾巴溜了。老两口倚在门口，指着敌人的背影，愤怒地骂道：“什么呱呱叫，呸！——”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群众舍生拚死地支援游击队的故事是说不完的。群众与游击队的这种情谊，是经受了长久的战火锻炼，决不是偶然的。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满怀革命激情，热烈地歌颂了这种骨肉情谊：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第九章 大发展

一

敌人苦心经营的“大搜山”破产之后，到了六月，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游击区四周的广东国民党军队悄悄撤走，出现了罕有的平静。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这时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加快了侵华步伐，于一九三五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冀察两省，进一步暴露其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屈辱妥协。他们置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加紧其“剿共”的反革命步骤。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抗日救亡的怒潮，一浪高于一浪。

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广东陈济棠、余汉谋的部队等，利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联合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围剿”我们游击区的余汉谋第一军，就这样从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撤走。

当余汉谋第一军撤走以后，剩下的地方保安团，也把脖子缩起来了。豪绅地主由于失去了靠山，一时惊恐万状。

这是赣南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有一部分同志对“两广事变”的性质认识不清，对陈济棠等抱有幻想。有的则提出要趁机恢复中央革命根

根据地，搞公开的政权。

项英、陈毅同志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部署新的斗争，召开了有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针对部分同志的思想，说：“革命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但以后不是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而是要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了。”

他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制订出新的斗争策略，积极开展我们的工作，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没有多久，“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所瓦解，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投靠了蒋介石。这幕“倒蒋抗日”的闹剧，便烟消云散。原来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一些同志，这才清醒过来。他们说，要不是坚持游击战的方针，革命又要遭受损失。

这个时候，项英、陈毅同志重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并决定发宣言，贴标语，散传单，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但有的同志对此提出非议，说：“这样会暴露目标，把敌人引进山来，自找麻烦。”陈毅同志说：“军事行动不管怎样秘密，但我们的政治口号一定是公开的、明确的。这样做，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项英同志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以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陈毅同志亲自拟稿，大家抄写，连夜出动，分三路出发，去张贴、散发标语和传单。在游击区边缘，我们还突然进入村庄，召集小型会议，向群众展开宣传活动。在白区，标语、传单一直贴到国民党乡公所、联保办事处的门上。一时间，赣县、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和三南等县城和墟镇，都贴有我们鲜明而又及时

的政治口号，不仅震惊了敌人，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宣传品，深入到人民的心里，鼓舞和指导了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边缘地区和白区的群众看了我们的传单、标语，就纷纷议论：“国民党天天讲游击队垮了，其实游击队还在，共产党还在。”

以党的名义、游击队的名义，对重大政治事件，发表宣言，表示态度，及时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是陈毅同志的一贯主张。他说：“我们到这里来打游击，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深入人心的战斗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这样做，可以让群众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从而能更好地动员和团结群众。游击队的大旗，无论如何不能倒。大旗倒了，就完全变成地下工作了。地下工作不可少，但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游击队。”后来，陈毅同志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说过：全国抗日战争到来时，共产党在西北有中央红军，有根据地。有根据地，有红军，就有了发言权。加上南方游击队，发言权就更大了。

我们遵照项英和陈毅同志的意见，曾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在“华北事变”之后，发表了《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宣言和其他标语、传单，在群众中，在国民党士兵中，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明确地表达我们党的主张，鲜明地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旗帜，早在红军主力转移时，陈毅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陈毅同志和梁伯台同志就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是：

白军士兵弟兄 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	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	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	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	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	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	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	当做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	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洲华北	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	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	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	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	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	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	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	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	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	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	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	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	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二

趁广东军阀离开游击区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决定集中部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

我们把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一次集中百把人、二百人，这也打，那也打，到处袭击敌人。信丰的两支游击队合并，集中在潭塘坑，打击反动的保安团。信南的游击队向南雄的马路边缘出击。三南、大龙等地的游击队也都进行了集中。

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油山游击队集合了两百来人。他们在革命群众的配合下，带着三挺机枪，从小汾出发，在板棚下偷渡章水，半夜包围了池江的国民党区公所和大庙，打了个把小时，就把这个反动据点打得稀里哗啦，生俘自卫队员数十名，缴枪数十支。天亮以前，胜利地回到小汾一带分散隐蔽。

在这前后，这支游击队还夜袭了青龙区公所。他们先向区公所外面的一个饭馆投掷了手榴弹，打开了通路，然后向区公所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并迅速地撤离了。第二天拂晓，许多人都拥到区公所来看，只见颓垣残壁上还在冒着青烟，有人还以为“红军游击队也用炮了”。接着，这支红军游击队还夜袭了长江、留地等墟镇的国民党区公所。袭击这些区公所，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国民党的报纸。果然，经过几次战斗，红军游击队缴获了不少国民党报纸，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黄道、叶飞、粟裕、刘英、谭余保、傅秋涛等“匪首”“活动猖獗”的消息，知道自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沦于敌手之后，他们仍在各游击区坚持领导游击战争，感到无比快慰。

向南雄水口、里栋、乌径、邓坑等地发起攻击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里应外合，迅速地解决了战斗。攻打乌径时，生俘反共自卫团长傅振标。攻打邓坑时，捉到土豪江碧山，他给我们送来了几十匹布、二三十条驳壳枪、大批西药和一笔款子。土豪劣绅爱钱如命，然而他有多大罪恶，自己心中有数，就怕杀头。所以，在他们受到惩罚时，宁愿罚款和为我们代办“违禁品”，以求保全性命。

北山一带有个大土豪姓邓，平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他在村前村后筑了两座碉堡，还有几十名团丁防守。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敢在家里睡觉。一天夜里，红军游击队根据群众的报告，悄悄地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鸡啼数遍，东方发白，这个大土豪，一手揉着惺忪的眼睛，一手挟着条毛毯，从他躲藏的地方往家里跑。当他走近家门口，游击队的枪口对准他时，他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游击队把他带走后，碉堡里胡乱放起枪来。游击队迅速越过了一个小山坡，选择了一块茅草丛生的开阔地，故意踩出一条“路”来，然后，埋伏在“路”的两旁，并留一部分埋伏在坑道口。这个阵势，就象“品”字形。不久，那些团丁追踪来到茅草地，当他们忽然不见游击队的足迹，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这些“饭桶团”被吓得跌跌撞撞没命地跑，跑到坑道口，又遭到埋伏在两旁的游击队的狙击。这次袭击，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缴获步枪十七支，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北山游击队侦察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到新镇附近去侦察敌情。他们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把新镇敌人据点的兵力、防守工事和地形摸得清清楚楚。游击队在一个晚上发动了进攻，经过一夜战斗，把敌人赶跑。被迫留下作掩护的三个国民党士兵，也被我们缴了枪，做了俘虏。天色微明，游击队员押着三个俘虏，携带着战利品，胜利地回到了驻地。

陈毅同志亲自审问了这三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说：“你们不要害怕，共产党对俘虏是优待的。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决不会杀害你们。”接着，陈毅同志让他们在草棚底下坐下来，详细地问了他们是怎样出来当兵？当了几年兵？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村上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器装备怎么样？等等。最后，陈毅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也是穷人出身，原来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专打土豪劣绅为穷人

闹翻身的，……”陈毅同志当即叫游击队发给每个俘虏三块银元，并向他们宣布：愿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

三个俘虏被释放后，除那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里继续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三个月以后，那个矮个子俘虏，带着另一名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一挺轻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了。

三南游击队同时也在军事上发动攻势，袭击了社径这个伪保安团的窝子。七月的一天黎明，事先侦察好情况和道路的侦察班长吴少华（“北山事件”后，他奉命带着一个短枪班来到三南游击队），带领十来个游击队员，直奔社径劣绅叶南山的住房，没等他穿好衣服就将他捆了起来。伪联保主任李志坚闻声躲进他的炮阁，放了两炮。在保丁拚命跑到保安中队去报告时，游击队找来木柴，淋上煤油，就点火烧炮阁。这时伪保安中队百余人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吴少华立即枪决了叶南山，然后从容撤离。早已埋伏在鲤鱼山后的游击队杀出掩护，且打且撤，安全地回到了游击中心区。

红军游击队的广泛出击，打击了反动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这对豪绅地主震动很大，在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几乎全跑光了。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广州，次等的跑到赣州，三等的跑到县城躲了起来。

随着红军游击队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也进一步从山里推向山外，推向平原，推向城镇。游击区不断扩大。油山、北山、大龙、三南游击区，都向四周伸张；长安、大阿、禾秋、九渡等墟镇，成了我们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

党组织还派人在新城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在赣州开设了一个钮扣厂，作为开辟城市工作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另在都县城开设了一家裁缝铺，作为我们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联系的联络点。

这个期间，党组织的建设也取得了进展。在大余油山地区建

立了中心区委。梅山区委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成立。彭坑、小汾、垵里和平里，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在三南，自中心县委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二十多个党支部，成立了小江中心区委和陂头、龙下两个分区委，以及定南月子光党支部。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各地还分别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积极发挥共青团员的作用。在“两广事变”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红军游击队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三

红军游击队的大发展，给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必要，我们这时也有了比较好的条件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刚上油山时，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缺乏。大家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左”派幼稚病》、《共产国际纲领》、《少共国际纲领》等书籍，几张旧的《红色中华报》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大家在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大家翻来翻去，这些书刊被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为了解决精神食粮，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指挥机关决定自己动手编教材。那时，项英、陈毅同志都亲自编写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教材，如关于形势教育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以及文化课本等，印发给大家学习。记得当时军事政治教材就有十多种，文化课本有五、六册。在政治教材中有：《群众工作者必读》、《步哨手册》、《反对十大坏现象》、《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

《红色指挥员必读》的内容是：(1)指挥员的职责；(2)共产党十大政纲；(3)红色战士的职责；(4)五大任务（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创造红军）；(5)五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爱惜

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准打人骂人)；(6)十项注意(武器不离身，说话要小心，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的腰包，对同志要友爱)；(7)射击要领；(8)刺杀要领；(9)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共青团信丰县委书记林毓亭同志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逼他交出一支由他保存的枪。他牢记“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的纪律，紧紧地咬着牙关，什么也没有讲。最后，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牺牲后，他的妻子按照他生前的嘱咐，从存放地点取出了那支枪，送还给游击队。

文化课本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阶级斗争常识等。这样，就把读书识字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这些课本，也吸收了游击队员自己创作的一些东西。大家读起来不仅容易懂，而且感到比较亲切。下面这首歌就是战士们自己创作的，

我本是一农民，
各种痛苦都受尽；
今天想起来，
怎能不伤心。
豪绅压迫，
地主剥削到如今，
一天到晚真辛苦，
满身血汗都流尽。
推翻地主阶级，
打倒帝国主义，
要不这样——
永做奴隶，不得翻身。

在深山密林里，歌声飞扬。游击战士的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游击战士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如钢。

第十章 “两面政权”

—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派出嫡系部队四十六师接替粤军，再次向我游击区发起了新的“清剿”。

一九三六年九月，为了部署粉碎敌四十六师的“清剿”，项英、陈毅同志召开干部会，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并作了一个“九月的决议”。决议除要求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外，还为我们制订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要我们放手搞“两面政权”。会后，我们在游击区派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去担任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

信丰黄坑口的共产党员李绍沧，瘦高个子，精明能干，村里群众都叫他“高佬”。敌人搞移民并村时，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份尚未暴露，便派他随同群众搬到锡坑去住，除了种田，还开了一间小店。国民党保长朱和亭见李绍沧是个买卖人，能说会算，就要他当甲长，组织上也同意了他去干这份差事。

一天，李绍沧到长安墟乡公所开会，领到一份“联防清剿条例”。会上，国民党乡长朱勉山咒骂了一通共产党游击队以后，专门责问李绍沧说：“李甲长，怎么你们上面坑内还有人开私会？”李绍沧故作惊讶地说：“没有听说呀！”朱勉山说：“你回去好好查访一下。”李绍沧说：“好，一定照办。”

李绍沧回到村里，连夜召开党的支部会，研究了对策，并派共产党员李绍珠，带着敌人的文件，进山向红军游击队作了汇报。

第二天，国民党开来了一连兵，敌连长要李绍沧带路搜山。李绍沧问：“搜哪座山？”敌连长说：“哪里有土匪就搜哪里。”李绍沧说：“有人报告说青山里猫公寓里发现一个棚子。”敌连长便决定去搜青山里。

李绍沧背起鱼篓在前面引路，把敌人带到青山里，指着一个山窝子说：“那里就是猫公寓。”敌人下到窝子一看，果然见有一个草棚子，棚子周围还杂乱地丢着一些烂锅头、破碗片、烂布条，还有一堆余烬未熄的柴灰。敌连长连忙命令士兵：“一排从左到右‘包搜’，二排从右向左‘包搜’，三排负责警戒。这次搜山决不许让‘土匪’跑掉。”李绍沧上前说：“连长，我下河沟捞点鱼子，好给弟兄们加菜。”敌连长点头说：“好，你在下面等着。”

敌人搜了老半天，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李绍沧不禁暗自好笑。敌人哪里知道，山窝里的那个场面是当地共产党在头天晚上开会之后连夜布置起来的。

李绍沧堆着笑脸，抚慰敌人说：“红军游击队在山里躲着反正跑不了。该回去吃饭了，明天再搜吧！我在河沟里捉到几条鱼，正好慰劳慰劳兄弟们。”敌连长见天近黄昏，快快地下令回防。

敌人的营部扎在中坝墟，四个连的士兵经常轮番到锡坑一带搜山。李绍沧和敌营长、连长搞得很熟。他们每次下来，他就忙着张罗烧鱼煮肉，殷勤接待。每逢中坝墟日，他还要给营长、连长捎点鱼干山味。敌营长、连长经常夸奖说：“李甲长呱呱叫。”

李绍沧常用保甲办事处名义去买红军游击队迫切需要的油盐、药品、电池、纸张等，然后交给群众带到山里去。

后来，他又随移民从锡坑搬回到黄坑口住。在黄坑口，由于叛徒、原信丰县委机关事务长王文阳的告密，他与共产党员李光松均被敌人关押了起来。

敌人在营部审问了他。

敌连长：“李甲长，怎么你也当起‘土匪’来了？”

李绍沧：“我一向安分守己，决不当‘土匪’。”

叛徒王文阳一旁插嘴说：“他跟‘土匪’做过买卖。”

为了出出王文阳的丑，他当场回答说：“事情倒有这么一回。那时你来找我买粮食，我不答应，你就要杀我。我没刀没枪，有什么办法。千怪万怪，都怪我住的地方不好。”

“你知道‘土匪’住的棚子，为什么不报？”王文阳象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又装腔作势地问道。

“你在游击队的时候，并没有把你住的棚子告诉我，我怎么会晓得呢？”李绍沧反问道。

王文阳面红耳赤，一时答不上话来。

李绍沧趁机进逼道：“文阳兄，讲话要凭良心啊！”接着，他转过脸对敌营长说：“我是政府的甲长，游击队怎会把他们住的棚子告诉我呢？”

王文阳还是咬住不放，忿忿地说：“你闻‘匪’不报，违犯‘联防清剿条例’，该当何罪？”

李绍沧也不退让，沉着地回答说：“你不要乱咬人。我报了没有，请在座的连长给我讲句公道话。”

敌连长说：“报了的。李甲长还亲自带领我连兄弟去抄过青山里。”

敌营长见此光景便开脱说：“嗯，李甲长说得有理。这完全是误会，莫怪了！”说罢，叫连长给李甲长开了一张证明，就把他放了。

后来，信丰县委的李绍仁同志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了。党组织要李绍沧出面保释。可是，按照国民党的“联防清剿条例”的规定，保释政治嫌疑犯要有“一保五甲”的联保，只他一个甲长是不能保的。于是他就同本保保长及一些甲长商量，但他们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此，他就与三个担任甲长的共产党员研究决定，

由均井坑甲长（共产党员）朱清绪冒充保长朱和亭，请一个进步青年学生充当甲长，东凑西凑，凑足“一保五甲”，然后用块蕃薯刻了个假公章，造好“保释书”，花了几十块大洋，把李绍仁同志从信丰的国民党监狱里保了出来。

二

在赤白交界区，我们根据项英、陈毅同志的意见，主要是搞“黄色村庄”。这是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具体做法是，我们依靠群众先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对他们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给他们讲约法八章：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队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同时，要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谈判告成时，要他们签字盖章。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浑身颤抖、魂不附体的保、甲长们，只好满口答应，乖乖地照办。限定的时间到了，药品、粮食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我们也按价付了钱。这样一来，所谓“通匪、济匪者杀”的命令，也就被丢到茅坑里去了。经过多次工作，有的几乎完全听命于我们，成了“白皮红心”的“两面派”——皮是国民党的，心属共产党，挂着国民党的牌子，为共产党干事情。

王坑的王保长就是这样的一个“两面派”。

王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去池江的必经之地。王坑的王保长以保护全坑的安全为名，强迫老百姓出钱买枪支弹药，并开设

工厂，自造土枪土炮，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充当国民党的帮凶。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就叫地主武装封锁交通要道，盘查从游击区到池江去的群众，并经常威胁群众说：见“土匪”来了，不打愣吆喝，要杀你一家子。因此，红军游击队在王坑一带开展工作就感到特别困难。

陈毅同志亲自和我们分析研究了王坑的情况，说：“王坑的群众，大部分是向着共产党游击队的，只要我们除掉王保长，或者把他争取成为两面派，王坑一带的工作就好开展了。”他决定亲自带几个同志去审问王保长。

一天夜里十一点钟。陈毅同志带了几个游击队员，悄悄地摸进了王坑，敲开了王保长的门。陈毅同志对惊魂未定的王保长说：“王保长，你不是常带国民党兵上山找游击队吗？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王保长的嘴皮哆哆嗦嗦，答不上来。陈毅同志当即警告他：“今晚我们游击队是来和你谈判的，你要放聪明点。如果你要耍弄点什么名堂，就别怪我们游击队对不起你。”

王保长耷拉着脑袋，说：“是，我有罪，……”

于是，陈毅同志在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开始了对王保长的审问。陈毅同志问他：你给“剿山”的国民党兵带过几次路？抓过多少老百姓？向老百姓敲诈了多少钱？抢过老百姓多少东西？为什么要组织地主武装，自造土枪土炮？……对这一连串问题，王保长一个也不敢作答。最后，陈毅同志问他：“你够不够死罪？”

王保长听了，“啊！”地大叫一声，瘫倒在地上，什么话也说出来了。

陈毅同志站了起来，正言厉色地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我们都见过，你这个小小的保长，几支土枪土炮能消灭我们吗？我问你：你愿死还是愿活？”

王保长叩头如捣大蒜，连声哀求说：“愿活，愿活……”

陈毅同志正告他：要活的话，必须答应四个条件：

一、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剿山”；

二、游击队员到坑里来，不准打锣吆喝，不准报告；

三、游击区群众去池江买东西，不准盘查扣留；

四、经常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准有半点掺假。

陈毅同志每说一条，王保长就答一句：“一定保证”，“一定效劳”。

经过这次审问之后，王保长被迫履行诺言，以后逐渐成了“两面派”，王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当然，我们在搞“黄色村庄”时，也遇到了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对这些家伙我们也决不客气。象大余梅山的反动保长廖桂山罪行累累，顽固不化。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的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杀掉廖桂山后，游击队即叫群众去向国民党报告，使群众免受牵连。我们把这些最反动的保、甲长整掉了一两个，其他保、甲长也就规矩些了。

三

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山里与平原的消息不通，我们又没有电台，也无法与外面通讯，长期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全国整个斗争形势，就很难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设法继续搞报纸，搞不到自己的报纸，也要搞些敌人的报纸。不管江西的、广东的、香港的报纸都要。

为了搞报纸，我们就把圪里贫农团的人找来，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大家认为，报纸本来谁都可以订阅，但我们订就不行，必须找一个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地位的人订，才不致引起怀疑。同时，在送报纸时，我们还要能秘密地接上头，把报纸拿

到手，送上山。

谁能承担这个任务呢？贫农团提出，黄老拐这个人比较合适。黄老拐名叫黄承祥，他左腿有点毛病，走起路来总是一拐一拐的，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浑名：黄老拐。他是巧里保学校的名誉校长，在国民党那边还吃得开，常在大余、池江一带活动。

为了做黄老拐的工作，当即研究了一个方案，由黄克廷和几个游击队员分头进行准备。

一天下午，黄老拐刚回到家，黄克廷就去请他过来喝酒。黄老拐白天走了点路，感到有些困倦。歪倒在靠椅上，但他一听到请喝酒，顿时眉开眼笑。他假意推让了一番后，就拿起文明棍，随着一拐一拐地来到了黄克廷的家。

他们喝了一阵子酒。黄老拐有了几分醉意，得意洋洋地扯了黄克廷一把，遮着嘴角说道：“唉！这次到大余，都劝我出任池江区长。本来嘛，为乡梓出力，义不容辞。克廷，你看怎样？哈哈，哈哈！……”

笑声未了，房门突然咿啊一声，闪出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手上的短枪咔嚓一声，全上了顶门火。黄老拐被吓得两腿瘫软，手里的酒杯落地，跌得粉碎。他慌张地问：“这，这，这是干什么？”一个游击队员上前一步，和蔼地说道：“黄先生，惊动你了，请不要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

黄老拐迭连声说：“是！是！我知道你们好，有什么吩咐，姓黄的一定效劳。”

于是，游击队就同他谈判订报纸的事，他满口答应，并签了字。从此，黄老拐按时给我们送来江西、广东等地的国民党报纸。

报纸到手，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敌人内部有些人也是可以利用的。

过了些时候，黄老拐想活动当池江区长，但他有一个强劲的对

手，活动得很厉害。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是有求于人的。为了进一步争取他成为“两面派”，我决定亲自去和他谈谈，做些工作。

当时，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连驻扎在圪里保学校，周围岗哨密布，要和黄老拐接头是不容易的，首先，他不便到山里来，也不肯到山里来，因为一旦暴露了，对他对我们都不利，何况他对我们的看法究竟怎样，还值得研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决定出敌不意，到圪里去，突入到敌人心脏里去。

这天晚上，我先派了几个同志潜入圪里，作了必要的布置。然后，我由黄克廷带领，亦步亦趋地向圪里走去。天色很黑，路不好走，好在黄克廷是土生土长的，由他带路，等于长了一双“夜眼”。

我们走到圪里村头一座十多公尺长的木桥上，操着本地方言，一面走，一面讲。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喝问道：“口令！”

黄克廷从容地答：“老百姓。”

“干什么的？”

“归来。”

敌人用电筒一照，看了看，放过了。

我们进到圪里，向右一转，躲过敌人第二道岗哨，翻过短墙，跨过两条路，穿过老百姓五、六栋屋，到了黄克廷家。接着就把黄老拐找来，由黄克廷作了介绍。我赞扬了他帮助游击队订报纸、买东西，并鼓励说：“请放心吧，红军游击队的事不会连累别人，但是你不要暴露目标。为游击队多做些事情，将来总是有好处的，游击队不会亏待你。谁来当池江区长，自然是会有人选择的。”

谈话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游击队员进屋来，要我为已经集合好的二十来个群众讲话。我讲话后，又对黄老拐说：“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共和卖国的罪行是联系在一起的，谁要蛮干到底，谁就会丧失人心；谁要团结抗日，谁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衷心希望黄先

生珍惜和红军游击队的关系，珍惜自己的前途！”

黄老拐是个有社会阅历的人，自然会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于是他陪笑说道：“陈先生，常言道：‘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而报’。承先生的栽培，兄弟自然竭尽绵薄，为红军游击队效劳。”

我们回来后，也为黄老拐做些工作，暗中帮黄老拐作点宣传，对他的政敌施加点压力，并公开揭露他的政敌的罪恶，在群众中造成一种舆论。不久，池江进行投票选举时，黄老拐以二十四票对二十三票，险胜了他的政敌，当上了池江区长。

黄老拐当上区长后，见到国民党的官兵喊“老总”，见到红军游击队喊“同志”，两边应付。他对红军游击队不得不履行诺言，为我们作了些掩护。比如上犹有个姓孔的同志在池江被国民党广东军抓去了，黄老拐就代我们去保释出来。国民党军队要搜山，他就对山里赶墟（赶集）的人说：“喂！明天不要乱跑呀，有军队去搜山。”他用这种办法带信给游击队。

我们还派人到池江购买游击队迫切需要的东西。对这，黄老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后来，我们又派黄种的赖信仁同志进池江的胡泰兴布店，以作裁缝为掩护，给红军游击队做联络工作。另外，我们还与池江曹聚隆百货商店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

从此，做“两面派”工作的经验进一步为油山中心区委的干部所接受，他们在平原的工作比以前更加活跃了。

四

在做“两面派”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采取“孙行者钻到牛魔王肚皮里去”的战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开展兵运工作，到白区去开展工运工作。我们从游击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强的地方，抽了一些骨干打进敌人的心脏里去，同那里的士兵、工人交朋友、拜弟兄，

积极开展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

我们在漂塘坞矿局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赤色细胞”在工人群众中不断扩散，矿山几乎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的耳目。每当夜幕降临，闪烁的灯火便在矿区漫山游动，使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传到工人骨干的耳里。以后，不仅许许多多工人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就连那国民党严密控制的矿警队里也有十一个矿警成了我们的人。

在一些驻防的国民党军队里，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给我们送情报。这样，国民党军队要到哪里去“清剿”，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可以从容不迫的转移，或乘机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而那些国民党军官被打得晕头转向、气急败坏地回到驻地时，红军游击队的宣传品，早已摊在他们的办公桌上：“……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由于有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就能广泛地开展起来。敌人强迫群众在山里修碉堡，红军游击队和党组织就动员群众一拖再拖；在敌人的武力强制下不得不去时，就动员一些老弱和妇女去应付，以延宕时间。等到碉堡快要筑成时，游击队夜里就去把它炸掉。结果是许多地方修了几个月的碉堡，始终没有筑起来，有的仅筑了一半，也只得停工。敌人毫无办法，最后只得由国民党派军队去筑。

群众对国民党买枪办“民团”的命令，也实行拖延和抗拒。一些地方把“民团”搞起来，游击队设法派人打进去，掌握枪支，使它不为国民党所用。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游击队以一部分力量在游击区内发动群众，而以大部分力量向外出击，转移敌人对游击区的注意力。比如，当敌人进攻游击区时，信丰游击队挺进到河东长演坝一带，建立了新的游击区。北山游击队向广东边境挺进，消灭了一部分“民

团”，缴获了一些枪支。后来，南山游击队与北山游击队合编，重新创造了一个新南山游击队。信南游击队向信丰、安远边境挺进，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游击队在游击区外的胜利出击，使敌人不得不抽出进攻游击区的军队去追击，而游击队又伺机转回游击区。

在敌人的包围分割之下，我们几个游击区，好象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但是，我们紧紧地依靠基本群众，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同时，又积极去做“两面派”的工作，这样，我们这么几个“岛屿”，就有着人民的海洋作依托，尽管敌人对我们严加封锁，却没有办法把我们困死、饿死。一九三六年冬天，天气很冷。但防冻的生活必需品，如棉衣、被毯、鞋袜和其它物品，陆续从池江送进山坑。昔日“饥同飞鸟争余粒，倦向丛茅索绣衾”的情景已成过去，出现了人们所料想不到的新局面。

第十一章 梅岭事件

一

在那漫漫的长夜里，陈毅同志翘首凝望西去长征的红军主力，默默祝祷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的伟大胜利，写了这样的诗句：

微石终能填血海，
大军遥祝渡金沙。
长夜无灯凝望眼，
包胥心事发初华。

这首诗，凝结着他对党和红军多么深厚的感情！他是多么惦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么热切地期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并及时得到指示呵！

是的，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之后到一九三六年秋，我们红军游击队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转战了两个年头。可是，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电报以外，南方各游击区就一直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项英、陈毅同志与南方其它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

那些日子，陈毅同志与项英同志商量，应当同中央建立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他们曾对我说：“要是能派个人到陕北就好了！可是谁能够去陕北呢？有的同志认为和党中央联系，路上危险太大，不能冒险。你和杨尚奎同志对路途又不熟悉。”

在这以前，我知道陈毅同志曾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和茅盾同

志，千方百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可是，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正在这个时候，赣粤边特委内线交通员黄亚光给我们送来了一封机密信。这封信是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写的。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一个大饭店里会面。大家得到这个讯息，自然都十分高兴。

陈海，原名陈宏，是红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由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流落到大余城郊修马路。一九三五年冬湘赣省委便派他和陈桂华一起，到国民党五十师做兵运工作。他们两人工作不慎，被敌人发觉后逃到了赣南，又通过关系找到信康县委。这时正逢叛徒龚楚窜到赣粤边进行破坏活动，信康县委感到他们两人形迹可疑，就加以扣留审查。后经过考察，没有发现叛变行为，就把他们两人释放了。接着又给了他们一笔经费，派他们到余汉谋部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不久，他们在余汉谋部第一师和第二师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

一九三六年间，上海的地下党派张斌，红六军团也派吴俊卿到余汉谋部开展兵运工作。陈海、陈桂华跟张斌、吴俊卿接上了头，并直接受他们的领导，而与赣粤边特委发生横的关系。过了一段时间，陈桂华被捕，张斌与吴俊卿逃离余汉谋部，陈海未暴露身份，仍留在白军中做兵运工作，并直接受赣粤边特委的领导。陈海曾几次到特委报告过工作，有时带来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刊物。有一次，他说国民党军队生活很苦，怨言很多，有两个连随时可以拉出来。陈毅同志对他说，应该钓大鱼。现在暂不要动，以免打草惊蛇。

这天，收到了陈海寄来的机密信件，陈毅同志真是喜出望外。他怕错过和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决定亲自去一趟。第二天，天麻麻亮，陈毅同志由新担任梅山区委书记的黄占龙同志带路，一同下

了梅山。

他们两人穿过莲花梁，到了大余城，决定先到陈海家中探明虚实。当他们来到陈海的家门前，只见一个妇女正在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就是陈海的老婆，就问她：“陈海先生在家吗？”她连头也不抬，神气十足地答：“到团部去了。”大余县广启安糖铺是当时我们设在大余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一个秘密交通站。陈毅同志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和黄占龙一起，直往广启安糖铺走去。当他们转弯走向糖铺时，只见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于是停住脚步，躲进一家茶馆喝茶。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同志，走近陈毅同志悄悄地说：“陈海叛变了！昨天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也抓走了。你们快走吧！”

这时，大街已经开始戒严，国民党的士兵正在街上盘查行人。陈毅和黄占龙同志沉着地离开茶馆，穿过一家老百姓的小屋，从小路绕出城去。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他们出城后便分开走，各自取道回梅山。

二

原来，叛徒陈海把信送出后，便在大余城等候我负责同志下山。他没有等到，便又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军队，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上来，把我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的斋坑包围起来了。

当时，指挥机关的警卫员曾忠山同志正在斋坑的棚子外面执勤放哨。他把注意力放在棚子正面的大道上，没有料到敌人会从后面包抄上来。因此，当他发现敌人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大吼一声：“反动派来了，快走哇！”边喊边举起枪来，一枪擦倒迎面而来的一个敌人，就滚下山去逃跑了。这一枪，不仅向棚子里的同志告了警，而且也使敌人吓了一跳，使他们不敢贸然前进。

项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员丁上淮、宋生发等同志听到枪声，立即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一个树木不多，但茅草倒很茂盛的小山包上隐藏起来。

不巧的是，这时有两个到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在棚子附近被敌人拦住了。这两个交通员，男的姓殷，女的叫彭茶妹（我们习惯叫她彭妹子）。老殷是个挺机灵的同志，当敌人用枪刺对准他时，他急忙举起手中的布伞，在敌人眼前虚晃了一下。敌人摸不准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被吓得倒退了几步，老殷趁势转身逃跑，冲出了包围圈。

彭妹子不知道敌人的意向，只顾从山下往山顶上跑，正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捉到一个‘土匪婆’啊！”敌人一面嚎叫着，一面对彭妹子拳打脚踢，逼问她：“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

我躲在茅草丛里，心里有点急，怕她经不起敌人的恐吓，万一说出什么来，那就糟了。

然而，不管敌人怎样骂她、打她、踢她，她始终坚持说：“两个人。”

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问她：“‘大头子’藏在哪里？”她怒目相向，只字不吐。

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狠命的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打她。她朝敌人的脸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道：“我不告诉你。”

后来，她的声音渐渐低微下去……我在草丛里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好象她已昏过去了。

说来有些奇怪，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三百多个敌人包抄我们，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搜不到我们。敌军官想出一条毒计，命令士兵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呼噜呼噜地燃烧起来。谁料天下真有这种巧事，正当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天

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不一会儿，哗啦哗啦落下了一阵倾盆大雨来，把火苗通通淋灭了。火燃不着，敌人可不甘心，命令士兵继续搜索。直到时近黄昏，这才吹号集合，排队下山。我正要从草丛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拨开草缝朝外一瞧，真危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却把队伍埋伏在山脚，要不仔细，可就上当了。敌人在山下呆了一会，看看山上毫无动静，眼看天快黑了，这才快快地走了。

三

正当敌人往山下撤走时，陈毅同志刚好从大余县城回到梅山来。他还不知道斋坑已经出事，所以，一个人信步走来，不想正撞进了敌人的包围圈。一个敌兵抓住他，恶狠狠地说：“老表给我们带路。”他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就是去捉游击队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说：“老总，对不起，我是外地人，路不熟。”那个敌兵瞪着眼睛说：“你不是本地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里来买茶叶。”那个敌兵命令他说：“教书也好，买茶叶也好，先给我们带路。”陈毅同志没有法子，只好往回带路。陈毅同志的沉着，迷惑了敌人。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见他那严肃的神气，不敢有所怠慢。刚好这一带盛产茶叶，说得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并且对刚才的失礼，还表示了歉意。敌军官为了显示自己也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同志攀谈起来。一路上，陈毅同志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为好。等进了一座村子，他忽然捧着肚子叫起痛来。敌兵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肚子痛得厉害，要解大便。”敌兵叫他到路旁的茅厕里去。过了很久，敌兵不见他出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便钻进茅厕里去

看，原来，陈毅同志早已跑掉了。

陈毅同志逃离敌军，躲进了树丛。他见一队队的国民党兵从山里往大余城的方向撤。便在树丛里观察了好一阵子，见敌人真的远去了，才摸回斋坑那个棚子来。他见棚子已被敌人糟踏得不成样子，东西也被抢劫一空，便走出棚子，在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我们的同志，便自言自语，高声的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他说了几遍，却没有人答应。

于是，他又一个个地呼喊着重英、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几个警卫员的名字。

他怕敌人折返回来，焦急地说：“难道都转移了吗？不可能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也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这时，陈毅同志的警卫员宋生发同志，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辨认出来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迎了过去。随后，我们几个人也都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先后来到陈毅同志的跟前。我们彼此紧紧地握手，热情地问这问那，真比阔别多年的亲人还要亲啊！在那严酷战争环境里，我们同受风吹雨打、蛰伏草丛之苦，同历生死的严峻考验，遇险之后，幸又重逢，真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我们内心的喜悦啊！

天黑了。树林里仿佛笼罩上一层层厚厚的绒幕。陈毅同志同我们讲了他进城经过和回来时的遭遇。我们也同他讲了敌人包抄棚子时的情景。接着，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敌人还会回来，决定马上离开斋坑。大家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在斋坑北边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果然，敌人又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猎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他们还乱打枪，乱喊乱

叫,为自己壮胆。这一切,我们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虽然相隔三十多里路,但实际上山与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我们听了敌人疯狂的嚎叫都觉得好笑。有的同志说:“要不是老刘同志及时回来,催着我们赶快离开斋坑,我们恐怕早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出不来了。”有的说:“要不是老天下大雨把火淋灭,我们也被烧死在里面了。”陈毅同志风趣地说:“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在这天晚上,曾忠山同志也摸到我们隐蔽的地方来了。原来,他在白天打了一枪,撩倒一个敌人,滚下山沟之后,敌人就拚命地追他。敌人为了“捉活的”,没有朝他开枪。可是敌人追了半天,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悻悻地走了。他脱离危险后,摸到附近一个老百姓的家里躲了起来。随后,他向那个老百姓买了一把砍柴刀,装作砍柴人,出来寻找游击队,终于在山上同我们碰到一块了。

第二天早上,那个突围而出的交通员老殷同志,也找到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两人的安全归来而高兴。

但是,彭妹子被敌人打成重伤之后,抬到大余城去了。后来我们打听到,她被关进监狱,备受敌人的拷打和毒刑。这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女共产党员、红军游击战士,始终没有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屈服。

彭妹子原是南雄的农村妇女,个子高大,机智勇敢,革命警惕性高。她既是交通员,又是炊事员。她常在深更半夜,只身穿过深山密林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当时我们红军游击队里有不少象彭妹子这样英勇顽强的女同志,她们经过战火的锻炼,已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逐步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她们是平凡的,然而,在她们身上却洋溢着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彭妹子牺牲了,她的精神不死!

我们在山上隐蔽了一天一晚,一无米,二无锅,什么也没有吃

的。曾忠山同志拿出他在他躲藏过的那个老百姓家里买来的五、六两米，让大家吃。本来他只买了一升米，而他已吃了一餐，所以只剩下这么一点米了。这五、六两米，真是比珍珠还要贵重啊！我们用一只压扁了的搪瓷口缸当“锅”，大家一边轮流做饭，一边站岗放哨。这时，每个人都早已饥肠辘辘，饿得发慌。可是，谁也不愿多吃一口。五、六两米，八、九个人，吃了一“餐”，还没有吃完，最后把剩下的，连同沟边采来的苦菜叶熬成了“稀饭”。那些“稀饭”的饭粒，粘在苦菜叶上，也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都吃光了。陈毅同志笑着对大家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支人参呢！”

敌人先后调集了四个营的兵力，把梅山团团围了二十多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我们忍饥耐寒，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把草鞋都磨穿了。

就在我们梅山被围、九死一生之际，身带伤病的陈毅同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激励着革命的诗情喷薄而出。他日夜伏在丛莽间，写下了他那豪气入云的“绝笔”：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梅岭三章》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是激励我们为真理而冲锋陷阵的战斗号角。它壮怀激烈，唱出了陈毅同志坚贞不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共产主义情操。“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就是说，生要持枪跃马，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奋斗不息，即使化为雄鬼，还要高举革命的旌旗，踏平阎王的森罗宝殿！这种视死如归，虽死犹生的精神，多么诚挚，何等可贵！“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说，现在个人牺牲了，但共产主义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陈毅同志在自料必死的万般危急的景况当中所表现出来那种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植于坚信共产主义的伟大抱负。

四

红军游击队并没有因“梅岭事件”而受到大的损失。但是，这一事件说明，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想搞垮我红军游击队的指挥机关，从而搞垮整个红军游击队。

我们事后查明，“梅岭事件”与“北山事件”一样，都是叛徒龚楚、何长林等一手阴谋策划的。

原来，有一天，当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品仙到南雄的里栋采购药品和食盐时，不巧被叛徒何长林发现，何对他多方进行威胁利诱，要他带人捉拿项英、陈毅同志，如果干成了可以得到重赏。毫无骨气的李品仙叛变了，当场供出了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敌人连夜把陈海抓起来，贪生怕死的陈海也叛变了，供出了我们在大余开“糖铺”做内线交通的黄亚光。随后敌人又诱捕了黄亚光。

黄亚光把所掌握的我指挥机关的一切情况向敌人告了密。于是大叛徒龚楚、何长林和陈海之流，为敌四十六师师长出谋策划，设下了骗取我领导同志到大余城碰面的阴险圈套；同时，敌人还派密探对梅山斋坑附近的地形，作了详细的侦察，作好武装包抄我指挥机关的准备。然后又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周围搜抄，妄图把我们一举消灭。但是，在机警而坚强的战士面前，敌人的卑鄙阴谋又彻底破产了。

“梅岭事件”以后，我们的指挥机关就更加注意隐蔽，总是设是最偏僻的地方，设在敌人最不容易找到的深山峻岭中。同时，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也进一步作了改进。

第十二章 突 变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敌四十六师突然从游击区的周围撤走了。地方反动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动弹，敌人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片惊慌与混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抓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象春风一样迅速吹遍了赣南地区。

许多游击队员和群众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笑容满面地说：“蒋该死被抓起来了！这个卖国反共的罪魁祸首应该赶快杀掉，用他的血来向全国人民谢罪。”有的认为：“捉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下我们也该下山打个痛快了。”

可是，过了不久蒋介石被释放了。同志们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的说：“张、杨到底玩的是什么鬼把戏？”“岂不是放虎归山？”这些言谈反映了大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十年血海深仇，也反映了有些同志不能从整个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去分析观察问题。

后来，我们从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比较详细的报道，才逐步弄清了事实真象。原来张、杨是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果断地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南京国民党政府内的亲日派何应钦，企图以讨伐

张、杨为名，扩大内战，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民族危亡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杨释放蒋介石，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以粉碎亲日派卖国投降，扩大内战的阴谋，促使全国走上对日抗战的道路。

在这个时局转换的重要时刻，项英、陈毅同志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区负责干部会议。

项英同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文章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

陈毅同志在负责干部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说：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他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二

果然，“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惊魂初定，就违反诺言，下达密令：“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共方之武装及地方组织。”

接着，蒋介石调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南方各省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其中，以反动军阀刘建绪为闽浙皖赣四省“剿共”总司令，率领十几个师的主力部队，向闽浙皖赣边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围攻；继续以国民党第四十六师进攻赣粤边游击区；以第五十

师进攻湘鄂赣游击区。他们又一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人民抗日的力量。

因此，“西安事变”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内战虽已停止，而南方各省游击区面临的形势，不是趋向缓和，而是顿时显得更加紧张了。

国民党四十六师先后向赣粤边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

第一次，敌人采取篦梳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发现可疑的山窝，敌人往往以一连人下山窝搜抄，一连人埋伏在山上，还有一连人在山口堵截。有时敌人把部队开到山里，假装搜抄两下，就把一部分部队开走，留下大部分埋伏起来，制造假象以迷惑游击队。后来又搞分区“清剿”，真是挖空心思，不择手段。

敌人的这些花招，全被我们识破了。在项英、陈毅同志指挥下，我们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攻弱的战术，把大部分兵力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同志在上乐、大湾里、坑口和大余一带，领导群众击退敌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开始是要求发还征收的粮食，要地主免息贷米，以后发展到抢仓库积谷，抢地主的粮食，打击了敌人的统治，支持了红军游击队。

敌人的这一次大的进攻，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在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油山、南康、赣县一带的时候，北山、南山和南雄等地的游击队趁机积极活动，打击反动的民团和豪绅地主，筹得了一大批款项，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不久，敌四十六师向赣粤边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敌人估计我红军游击队主力已转移到信南、信康、康赣三个游

击区，便采用全面搜查、重点“清剿”的办法，妄图最后消灭我红军游击队。敌人还把我游击区划为三个“绥靖区”，每个区配备一部分正规军，配合保安团和地方武装，并胁迫群众带四十天的伙食费，协同正规军对我实行重点“清剿”。

我们从一个国民党保长那里，得到了敌人的这个新的“清剿”计划，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通知各县委和各游击队，化整为零，由集中到分散；领导同志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时的空隙，迅速转移。各分队尽量不互相往来，以保守秘密；交通往来，避开大路和小路，在山里走草径，遇到水沟，则在山涧里走，以确保安全；

准备好四十天的粮食，白天不许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在发动和组织进步群众侦察敌情的同时，做好争取落后群众的工作，使敌人失掉耳目；

命令信南游击队向外线出击，挺进到龙南、全南、定南和安远边界，吸引敌人；北山游击队向大余、南雄边界积极行动，以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

在党员和游击队员中，加强政治教育，提高斗争的信心与决心，同时继续开展反叛徒斗争，纯洁内部。

在我们积极进行部署时，敌人对信南、康赣、信康三个游击区的分区“绥靖”、“清剿”开始了。其中以对信南游击区的“清剿”最为猛烈。他们与我们指挥机关的联系也完全被切断。

敌人对康赣游击区集中进攻了大龙地区。这时，大龙地区的游击队已转移到北山。坚持在大龙游击区的党组织和地下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敌人进攻时，化整为零，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紧密结合，白天分散隐蔽，或回家生产，晚上集中打击敌人。敌人对我

捉摸不定，就日夜埋伏，侦察我之活动。由于我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掩护，敌人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这次分区“绥靖”、“清剿”中，敌人没有到油山和北山。活跃在这两个游击区的游击队，抓住时机，打土匪，毙民团，捉土豪，筹经费，战果累累。北山游击队还与南河、白云、天仙洞一带的群众恢复了联系，扩大了游击区。

敌四十六师发起的这次进攻，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这一时期，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已遍及全国，党的团结抗战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和群众，在已有反“清剿”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加坚决的斗争，我们终于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而斗争又最残酷的岁月。

三

在迎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后胜利的时刻，激起了我们对过去三年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怀念。

瞿秋白、何叔衡、阮啸仙、贺昌、刘伯坚、李天柱等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优秀干部，是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或被捕后英勇就义的；蔡会文同志是到达湘南桂东一带以后在作战中牺牲的；李乐天、曾彪、叶明魁和曾纪才等同志，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直到今天，他们的光辉形象和音容笑貌，还鲜明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蔡会文同志在长岭会议后，率领部队到崇义、上犹地区，向湘南桂东一带发展。此后，他便与我们失去联系。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后，才听说他已经牺牲。至于他是怎样牺牲的，由于消息阻梗，无法弄准确。我当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是：湘南桂东一带，动摇分子红四团团长李宗保和团政委邝珠权，相继叛变投敌。蔡会文同志便和赣粤边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同志一起，在这个地区坚持

斗争。一九三五年十月，部队在桂东小水山桃树窝一带，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突围中，蔡会文同志亲率警卫班首先渡河，不幸牺牲，方维夏同志也在山田被叛徒杀害。恶噩传来，大家悲痛万分，都为失去象他们这样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而痛惜。特别是蔡会文同志，他与我突围上油山时，同生死，共命运，历尽千难万险。他的牺牲，更激起我对他的无限哀思。他对党忠心耿耿，指挥作战英勇果断沉着。他那崇高的英雄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蔡会文同志牺牲后，湘南桂东一带留下的部队在王赤同志领导下继续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

蔡会文同志是湖南攸县山田村人。他年轻英俊，机智勇敢，能诗善文，文武双全。据说，他在山田小学读书时，老师出了一篇作文题目：《我的家乡》。他从小目睹村里豪绅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一直为之愤愤不平，便在这篇作文里，写下了如下诗句：

有山又有田，
地名叫山田。
农民做牛马，
豪绅象神仙。
同生一块地，
贫富两重天。
何时能平均？
我要问苍天！

老师认为他很有文才，便为他取名：会文。

蔡会文同志，从小就向往革命。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随后上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连的党代表。一九三〇年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政治委员，一九三一

年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二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和红八军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任赣南军区司令员。

“西安事变”以后，我指挥机关考虑到三南地区的斗争特别艰苦，便派李乐天同志带着游击队小队长“猛张飞”和一个管理员、两个交通员，前去三南指导工作。他们到达雄信公路封锁线时，见公路上时有敌人巡逻，公路两边的群众，已都被敌人逼走。他们三番四次设法通过封锁线，都没有成功。最后冒了极大的危险，在崇仙、焦山一带越过公路，进入三南。他们到达三南地区后，一直没有能够与党的地下交通站和红军游击队联系上，便在山上住了四、五天，随带的干粮也吃光了，李乐天同志派警卫员下山，到小河附近弄饭吃，不幸被国民党保长发现，敌人便在小河一带布置了暗探。第二天，当他和随行人员下山时，被敌人包围起来。最后被压在一个小屋场里。为了集中火力突出包围圈，就用手榴弹开路，冲上屋场后面的高山。在战斗中他的脚负了重伤，行动困难，“猛张飞”等几位同志竭力掩护他，且战且退，奋勇朝山上爬。他因为伤势很重，流血过多，而敌人又渐渐地逼近了。就坚决地命令随行人员不要管他，赶快走。随行人员哪里肯听，坚持要背着他一起走。当敌人快要冲到跟前时，他毅然甩开警卫员，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转移，自己单独与敌人周旋。这时，陆续冲上来的敌人足足有一个连，把他团团围困在里面。最后，李乐天同志击毙了冲上来的几个敌人，自己也英勇地牺牲了。

李乐天同志是广东南雄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共赣南特委领导的武装暴动，任游击大队负责人。一九三一年后，一直领导赣粤边游击大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他又立下了许多新的战功，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爱戴。

当李乐天同志遇难的噩耗传到游击队时，他的爱人、女游击队

员吴丙秀（共青团员），抹了抹眼泪，对她的战友陈妹子说：“姐姐，你们不要替我难过，我挺得住的。我们南雄有首山歌：‘砍了竹子有竹笋，拗了笋子有竹根’。只要把游击战争坚持下去，总有出头的日子。”吴丙秀同志曾与我们一起，在大余的小汾一带打游击，饱经战火的考验而愈战愈坚强。吴丙秀与我是同年，都是丙辰年生的。她说，她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取名“丙秀”。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当她和油山中心区委书记丁祖诒、游击战士吕新洪、孔炳生等四位同志，在小汾开展工作时，住在一个姓黄的老百姓家里。天未破晓，从南雄来的“铲共团”突然包围了小汾，挨家搜查，吊打群众。吴丙秀等四人生怕连累群众，急忙从屋后的一个菜园突围。由于菜园围墙高，当吴丙秀翻越菜园的围墙，朝一条田塍奔跑时被蜂涌而来的敌人拦住，当场惨遭杀害。由于她是在围墙外被敌人拦住的，这就避免了留给敌人以迫害群众的借口。因此，她住过的那家姓黄的老百姓，没有受到牵连。

李乐天同志的亲密战友叶明魁同志，也是在“西安事变”以后，敌人对大余一带大举“绥靖”、“清剿”时牺牲的。叶明魁同志是大余边境工作组组长，他在留地附近开展工作时，给敌人的便衣拦住了。有个叛徒认得他，便大叫：“他就是叶明魁，我们天天要捉他，今天送上门来，决不能放过他！”叶明魁随即掏出手枪，与敌人交火，且战且退，退到一条很深的水沟里，继续抵抗。叶明魁同志一连打死了几个敌人，自己也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西安事变”以后，在粉碎四十六师的进攻中，曾彪同志也光荣地献出了生命。那是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带着一支游击队袭击池江西北丫山脚的国民党保安团。当他举手抓住树兜欲翻过保安团的院墙时，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手背的动脉管，流血不止。连夜抬回蕉萍，第二天就牺牲了。在游击战争中，为了防止枪支丢失，我们在每支驳壳枪上都系着一根粗粗的保险带，持枪者就

把保险带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曾彪同志的驳壳枪柄被敌人的子弹打歪时，手枪还一直吊挂在他的脖子上！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曾彪同志一直同我一起在油山地区战斗。他身体魁伟，性格刚直，待人和气，打起仗来很勇敢。油山地区的群众都晓得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曾爷爷”。他的牺牲，使群众深为痛惜。

原代英县委书记、后任大龙中心区委书记的曾纪才同志，更是特别使人怀念。他在大龙这一带，英勇善战，著有声威。因敌人指名捉他，领导上准备把他调离大龙区。正在这个时候，他不幸被叛徒出卖了。敌人审讯他时，他说：“不用问了，我就是曾纪才。”敌人问他大龙区还有多少游击队员？他说：“数不清。”敌人进一步逼供时，他怒不可遏，大声说：

“问什么，我抓住你，绝不多问。”

以后，敌人一再对他严刑拷打，而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曾纪才同志，始终未吐一字。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曾纪才同志受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历尽千辛万苦。但他的革命志气并未稍懈，也不因此对组织有一丝半点的埋怨。在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沿途讨饭，千方百计地去找组织。他和项英、陈毅同志会合以后，欣然接受新的使命，协助他们突出重围上油山。到达油山以后，我经常听到他在大龙区领导群众和敌人英勇斗争的事迹。他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子弟兵，革命战士的好榜样！

革命先烈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他们用鲜血谱写的光辉业绩，永垂不朽！

第十三章 谈 判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了。

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有关芦沟桥事变的报道时，情不自禁地欢呼抗日的号炮响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民党继续和日寇明里暗里在搞“谈判”，估计蒋介石向日寇妥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从坚持游击战争转变到迎接抗日的新局面？怎样从以军事斗争为重心，转变到以政治斗争为重心呢？我们象久旱盼甘霖似地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到了七月底，我们终于通过同情者的手，取得了一些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项英、陈毅同志仔细地阅读着，一心想从那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寻找党的指示。读着读着，陈毅同志忽然高兴地拍起手来，说道：“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

原来在一本叫做《新学识》的进步杂志里，有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曾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条件，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我们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快三年了。现在，总算是间接地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指示，真是如获至宝。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迎接这一缕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里透射过来的阳光，努力领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精神，项英、陈毅同志与我们一起，认真地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并以项英同志个人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争取。游击队必须遵照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必须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此后，我们的工作即转向抗日，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在这个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过渡的战略转变关头，陈毅同志写的《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把他那时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表达得十分生动、鲜明。

十年争战后，
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
潜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

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侪，
莫作陈独秀。

这首词的上半阙，是对已经过去的十年内战的回顾，着力谴责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屠杀政策造成的空前悲剧。下半阙，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指出在实行战略转变的时候，既要反对那种不愿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甚至把国共合作抗日说成是“阶级投降”的错误，又要防止那种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造成第二次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陈毅同志对我们提出的这个告诫，具有深刻的预见性，多么发人深省呀！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要求：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抗日义勇军，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等等。

为了使更多的人接受党的正确主张，我们在根据地内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进剿’游击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我们用书信形式把这些宣言和口号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四十六师师部，以及国民党的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政府，寄给当地上层社会人士。还把这些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流到赣州等地。广泛的政治宣传，使我党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不热烈拥护；就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读了抗日义勇军的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也赞叹说：“共

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但是，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国民党军队，却借此大造谣言，颠倒黑白，说什么抗日义勇军要“归顺”他们，并卑鄙地发出信件，要义勇军的负责人出来“自新”，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不愿去的可以回家种田，等等。一些反动豪绅地主也乘机大造谣言，污蔑义勇军，挑拨义勇军与群众的关系。

我们坚决地回击了敌人的造谣污蔑，严厉地斥责了国民党地方当局违反两党合作的精神，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严正指出只有承认共产党和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特别是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全国抗战怒潮汹涌澎湃，国民党才被迫实行抗战，被迫承认共产党组织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陆续从游击区周围撤走。

在这个情况下，项英、陈毅同志决定发一个“快邮代电”给国民党大余县长。内容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希望国民党也停止对游击区进攻。大余县长对我派去送信的同志“盛情款待”，并马上写了回信，希望游击队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不久，项英、陈毅同志就在池江西北部的一座大山上召开了赣粤边区干部大会。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在思想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会后，各地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让义勇军开赴前线去”的口号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搞得热火朝天。

接着，国民党四十六师、国民党大余、南康、南雄、信丰等县县长被迫联署发出了《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说：“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现在是志士抗日救国之时，欢

迎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一时腔调大变。

项英、陈毅同志当即提出了扩大影响，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以与北上红军主力，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陈毅同志还说，我们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是要谈的，要“舌战群儒”，不要缩手缩脚，但是也不能失去警惕性。

于是，我们一面积极扩大部队，壮大自己的力量；一面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时，抗日义勇军的武装宣传队，到大墟镇以至县城城郊开展宣传活动，影响很大。

二

八月下旬，陈毅同志作为我方代表，到大余县城与国民党县长谈判。当他到达县城时，各界群众在东山门外，夹道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口号，情绪十分热烈。国民党人士也挤在欢迎的人群里，而且不得不显得殷勤的样子。

在谈判开始的时候，陈毅同志就向大余县长提出：“我是来看形势的，不能发表更多的意见。南方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大余县长满口应承，还连连说：“你们来好了！老实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江西是你们的了。”

但是，在这种“好意”后面，却射来了暗箭。第二天，国民党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显眼的消息，将合作抗日的谈判，诬蔑为“油山共匪投诚”。

对国民党的这种两面派手法，陈毅同志当场提出了严正抗议，说：“是谈判就来，投诚不干。”

大余县县长说：“陈先生，对不起，这是官样文章，是做样子给

英、美看的。说是‘投诚’，实际上是合作。”还说：“这是县党部干的，国民党搞的就是这一套。”

既然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陈毅同志即表示愿意与县党部谈。说：“三民主义难道可以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国主义吗？！”

那位县长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跟他们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跟这有什么关系？”

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还有一个肖司令。当陈毅同志在谈判桌上提出要他们马上停止冲突，并给游击队以交通方便，以联合南方各游击队时，那个肖司令话中带刺说：“陈先生，江西除了八个保安团，这里还有不少兵。”陈毅同志针锋相对地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了，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那个肖司令听了，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经过陈毅同志的据理斗争，国民党报纸终于改变口气，作了较为正确的报道，说陈毅同志是代表共产党“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但大余县县长对陈毅同志所提的条件却不敢作主，请陈毅同志到赣州与省政府的代表谈。

于是，陈毅同志又到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

当陈毅同志到达赣州时，全城到处出现油印的宣传品：“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这天，赣州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当陈毅同志一下车子，人群中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的乐曲。陈毅同志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

早在一九三五年初，当我们突围到油山不久，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陈毅同志曾作过这样的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

将来国民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合作抗日，倒是可能的。”三年前的预言，这时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的发展证明，陈毅同志真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赣州的谈判中，我方提出：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部队必须保持独立性和党的领导权，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另外，在谈判前要求打电话给中共中央报告南方游击队的情况。国民党则提出什么：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改编等条件。国民党四十六师代表、师政治部主任，还大放厥词，说什么“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同志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

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

陈毅同志愤怒地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说：“是，是，很对，很对。”

谈判告一段落，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宴会。在酒席上，那些国民党官员，七嘴八舌，要陈毅同志谈谈下山以后的感想，陈毅同志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二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价了，涨到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五万元跌到三万元，后来又跌到了二百元。你们出二百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陈毅同志对国

民党的彻底揭露和无情讽刺，把国民党官员们弄得面面相觑，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国民党地方当局否定国共合作的阴谋被揭穿了，赣州谈判获得初步胜利。双方达成协议：游击队按我方提出的办法，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供给。其他问题，国民党当局只同意报省政府作最后决定，并且担保可以解决。但我方要求公开打电报给党中央，他们却借口什么“国际关系”而加以拒绝，继续阻挠我们南方游击队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而他们对所达成的协议，却始终不敢向群众公布。

在赣州谈判期间，大叛徒、原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妄图拉拢陈毅同志。他一再诡辩说，他是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接着，更荒谬地说：“现在我们总算走到一块来了，只不过我比你早来了一步。中国搞共产主义，还远不是那个时候。”陈毅同志听了，怀着满腔怒火，拍案痛斥了这个叛变革命、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并严正表明：“我是代表共产党来和国民党谈判的。……”陈洪时只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为了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改编为抗日队伍的问题，项英同志于九月底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在南昌，项英同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国共合作宣言》和《告全党同志书》等文件。当大家读到这些文件时，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我们就象一度失去了娘的孩子，重新回到慈母的怀抱那样，感到无比温暖。

南昌谈判，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不久，游击区四周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也陆续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三

在项英、陈毅同志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期间，南方八省大部分游击区也从报刊上了解到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觉察到了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因而积极设法掌握新的情况，研究政策，与各地国民党地方当局，先后开始了实现停战、合作抗日的谈判。

但是，国民党对谈判是没有诚意的。他们或者以“谈判”掩护它的军事进攻；或者诱我下山加以消灭；或者企图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保安团，进而吃掉我们；或者企图利用叛徒来“招抚”收编红军游击队；再不就是利用谈判，要红军游击队停止活动，不发给军饷，而又禁止红军游击队筹款等等，总之，国民党在谈判中，就是企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清剿”中未能实现的消灭我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因此，与国民党的停战谈判，就成了一场极为复杂、尖锐的斗争。

当时，大多数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谈判中坚持了党的原则，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同时，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可是，也有少数游击区在谈判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或对新形势认识不足，以致遭到了一些损失或者是走了一些弯路。

的确，从坚持游击战争到迎接抗日高潮，这又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在这个转折的时候，我们既要警惕国民党利用谈判消灭游击队的阴谋，也要同其他错误倾向作斗争。记得当时有的同志以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陈毅同志及时提醒大家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他还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三年五年是‘长期’，三个五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

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第十四章 集中

一

南昌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同志先去南京，后赴延安。陈毅同志到南方其他游击区联系游击队集中整训和下山等事宜。赣粤边游击区由杨尚奎同志和我负责集中整训部队、扩大部队和准备物资，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在集中训练部队时，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油山和北山地区的游击队，先后下山，在信丰县的潭塘坑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逐步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墟镇，而是驻在大余的坊里、板棚下和池江一带的农村里。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为了防止意外，还在从板棚下到池江一线，同国民党驻军接近的地方，划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在部队集中整训时，战士们对改编部队，改变番号，换发军装，在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记得有的战士见到发下国民党的军衣军帽，真是一肚子火，说：“‘五角星’（指红军的五星帽徽）同‘十二角星’（指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经过我们耐心的说服教育，战士们才勉强换上国民党军装；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地打在包袱里。是的，我们虽然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

且也正是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任。

二

北山与油山的游击队在集中整训时，三南的游击队还在那里作战。我按照项英、陈毅同志临走前交代的任务，先到三南去联络部队。我和乌径区委书记肖信明、交通员游高连等同志，拿着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介绍信，去找国民党大余县长。大余县长派了个秘书，陪我们一同到南雄，住在岭南茶楼。

在那里，我们同国民党南雄县县长和驻军师长进行了商谈。我当面揭穿他们违反停战协议、消灭三南游击队的阴谋，要他们停止“清剿”，保证三南游击队安全地开到集中地点。国民党县长理屈词穷，不得不接受我们的主张，答应我们到三南地区去寻找游击队时给以方便。

我们三人从乌径出发，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新龙时，天色已经不早，就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随后，肖信明同志就出去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他见到国民党保安队的院子里绑着一个妇女，就向附近一个铺子的老板探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板说：“是梅三子的老婆。”肖信明又问：“她犯了什么罪？”老板说：“她老公当红军。”肖信明听了十分气愤，回来跟我谈了这个情况，我立即去找保安队交涉。开始，那个保安队长盛气凌人，蛮横无理，不肯释放。我就严正警告他，无理扣押红军家属，是违背国共合作协定的，我要打电话找你们的师长追究责任。那个队长听了着慌起来，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恳求说：“陈先生，请不要打电话，我放人就是了，马上就放。”

任意关押和屠杀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封锁，许多地方还不知道

国共停战的消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寻找三南游击队的过程中，沿途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写了好些标语和传单，到墟镇上张贴，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以扩大我政治影响。

我们在南雄没有找到游击队。后来还是从一个国民党乡长的嘴里，得到了一点关于游击队已转移到陂头去的消息。于是，我们就转到陂头去找。

游击队究竟在哪个山头呢？我们几乎跑遍了陂头的各个村庄，都没有打听到结果。正在焦急的时候，肖信明发现有个向群众买菜的人很面熟，上前一看，原来是三南游击队事务长张三木同志。肖信明高兴地问他：部队在哪里？张三木同志推说不知道。肖信明把他引到我们住的屋里，我对他说，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合作，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找你们，把部队带下山整训，准备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张三木同志回到山上，向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同志作了报告。张日清同志问：“他们可带有证明？”他说：“没有。”张日清同志想：“我虽认识阿丕同志，但他没有带来一个字，空口无凭。何况我们分别已两年多了，他今天究竟是……。”游击队几个负责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再派张三木同志带两个战士来探明虚实，并索取证件。我即把《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件和一张《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交给张三木同志，并向他详细讲解了全国革命的新形势。后来，张三木同志就来带我们去到杨梅石游击队驻地，会见了张日清同志。我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他看到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在这一刹那间，这喜悦的泪珠，真是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表达了我们心坎里的革命情谊。

我在杨梅石住了两天，同他们谈了当前形势及项英、陈毅同志下山谈判的情况，要他们集中部队休整，准备整编抗日，并要他们

把捉来的土豪全部释放，枪也归还。他们听了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三南游击队在张日清等同志率领下，开到池江整训。

三

在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时，常常遇到国民党的阴谋诡计。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项英、陈毅同志在池江时，坚持战斗在红都瑞金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派彭胜标同志到池江向他们汇报工作。他们随即作了指示。彭提出要求说，我回去传达党的抗日救国的指示，怕讲不清楚，同志们听了可能不会相信，最好派个代表去传达一下。项英、陈毅同志研究了彭胜标的意见，决定派我到瑞金向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传达。

我一到瑞金，就去拜会国民党县长，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我从国民党县政府出来，刚在一家旅馆住下，国民党保安大队的一个军官，挂着三角皮带，腰别手枪，到旅馆求见。一见面，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也讲了几句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話，还对我到瑞金联系红军游击队表示欢迎。接着，他就心怀鬼胎地提出，要我告诉瑞金的游击队快快下山，和他们一起合作抗日。我立即觉察到他们是企图借机吃掉游击队，又见他神色中露出威胁之意，便正言厉色地回答说：根据项英、陈毅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达成的协议，你们有义务为我提供方便，及时与瑞金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我是奉项英、陈毅之命而来，瑞金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当然只能听命于项英、陈毅。这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用含着敌意的言语，和我争辩起来。恰好这时那个国民党县长到旅馆看我，见此情景，连忙对我说：“陈先生，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又当着我的面训斥了那个军官两句，那个军官灰溜溜地走掉了。事情很清楚，那个军官分明是国民党县长派来试探我的；后来，国

国民党县长又以回拜为名，出来打了个圆场。他们串演的这幕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双簧丑剧，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天，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我顺利到达闽赣边游击队司令部驻地，见到了瑞金县委书记胡荣佳同志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钟德胜、彭胜标和张开荆等同志。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对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同他们联系，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他们认为，三年来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斗争与整个党的斗争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我到达游击根据地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游击队员们纷纷拥到司令部向我热情问候，探听消息，其中就有来自我的家乡福建长汀县南阳的同志，使我倍感亲切。在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欢聚中，我向大家讲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些指示精神，传达了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这时，战士们个个欢欣若狂，跳着笑着，流着热泪，唱起了当时瑞金流传的一首民歌：“黄田府，粟坑县，白竹寨是金銮殿。白竹寨上飘红旗，白军到处受我歼。”

我从山上下来，途经瑞金县城时，国民党县长得知我是长汀人，劝我坐汽车回汀州城看看，还说可以保证我的安全。我考虑我已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应当赶快回去向组织汇报；同时，我想起那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居心叵测的那番话语，便断然谢绝国民党县长的“好意”，赶快回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地点。

当我回到赣粤边不久，一支由王赤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从桂东开到池江整训。

四

赣粤边和闽赣边各路游击队分批来到池江以后，除继续进行整顿和扩编外，还派出宣传队，四出开展党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每逢池江的墟日，杨尚奎同志等还都跑到街头去演讲。

我们还趁此机会，派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联络那里的党员，恢复党的关系，组织红色战士归队。在赣州、瑞金、于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还陆续建立了地下工作阵地。

赣粤边游击区和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池江探望。其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象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怀抱一样，多么高兴啊！游击区的群众，老老少少，更是象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东西，来到池江探望亲人，表达他们的心意。

这时，池江上空，抗日义勇军的鲜红旗帜，迎风飘扬。章水两岸，嘹亮激越的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欢唱。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义勇军。”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我在信丰、大余等地亲眼看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赣粤边的群众纷纷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障碍，加入了义勇军。在短短几个月内，部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

一九三八年初，我们与其他兄弟游击队一起，正式编入了新四军，待命北上抗日。

第十五章 下山

一

芦沟桥战场的隆隆炮声，震撼祖国大地；上海战场的抗日浪潮，席卷亿万神州。在我们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训的那些日子里，坚持战斗在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正分别通过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协议，积极准备下山，奔赴抗日前线。

但当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游击队领导者的认识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不善于抓住机会，放手扩充力量，壮大自己。加上各游击区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隔绝之下，因此接关系也非常困难，以致在实现南昌停战协定上，步调一时难以一致。

为了正确贯彻中央指示，全面地执行停战协定，组织各路游击队下山，项英、陈毅同志做了大量联系和说服教育工作。陈毅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湘赣边等游击区，向他们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指示，亲自向他们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他同我谈起他在湘赣边进行工作的那一段曲折经历，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

湘赣边游击队是一支很坚强的游击队。红军主力长征之后，他们受到了十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与“清剿”。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一次同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湘赣边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同志光荣地牺牲了。由于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投敌，跑到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当“湘赣边区招抚员”去了，这时整个部队几乎垮掉。在这个危急关头，立场坚定，勇敢刚毅的谭余保同志挺身而出，集合了失散的同志，组成湘赣临时省委、湘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和湘赣

边游击队司令部。他在成立大会上愤怒地谴责了陈洪时的叛变行径，庄严地宣誓说：“湘赣边区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根据地，树在这里的红旗决不会倒！”

他们以武功山为依托，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并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扩大了游击区。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游击队的贼心不死，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还集中了十几个团进攻湘赣边主力所在地——九龙山地区。因此，他们对敌人利用软硬两手消灭游击队的阴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守卫在九龙山一个山口哨位上的战士，突然向连部发出了发生紧急情况信号。

接着，一乘四人抬着的轿子朝着山口过来，轿子左右前后还跟着轮替抬轿的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山口的同志们，严阵以待，警惕地注视着。

“站住！”游击队员厉声地命令着。

轿子在哨位旁边停住了，从轿里从容走出一位英姿焕发、气宇轩昂的人来。他头戴一顶博士帽，身穿一套中山装，脚登一双黑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他举止潇洒，仪表端庄。

游击战士看到这位不寻常的来客，拉动枪栓，大声喝问：

“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干什么的？”

“从吉安来。”他平静地回答。

“到哪里去？”游击队员们又是一声喝问。

来人摘下墨镜，把游击队员们打量了一番，微笑着说：“找谭余保同志。”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游击队员，名片正中印着“陈毅”两字，旁边一行小字是：“四川乐至”。

接着，陈毅同志对游击队员说：“请带我到谭余保同志那里去好吗？”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陈毅同志为了安全上山，特意作这身打扮，并由国民党卫兵出面护送，沿途也可以省得麻烦。

陈毅同志交付了轿夫的工钱，打发轿夫和国民党卫兵回去，然后随游击队员们上了山。

到了山上，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同志接待了他。

一封由项英同志具名的介绍信，摆在松树做成的桌上。信上写着：特派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国共合作事宜。

他们看过介绍信后，半信半疑，而项英同志的签具又是事实。段焕竞和刘培善同志没了主意。“要提高警惕”这几个字，不时在他们头脑里盘旋。

就在两个月前，有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联络员到了山上。这个家伙走后不久，接着就来了大批国民党军队“清剿”游击队。多么残酷复杂的斗争环境啊！而陈毅同志又是这副装束，贸然上山。这不能不使他们产生怀疑和特别警惕。他们担心国民党军队会沿着陈毅同志上山的路线又来搜山。因此，部队当晚加强了戒备，并把陈毅同志转移到另外一个山头上。

陈毅同志向他们讲解当时的国内形势，逐条地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彻底战胜日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现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矛盾已经超过了阶级矛盾。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坚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去。”

他们听了，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和他们合作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眼前，山下就屯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呢？

他们向陈毅同志要证明，他没有。问他为什么一个人来？他说，多带人太危险。而他又劝游击队：一、停止打仗；二、整训改编

军队。

可是，当时湘赣省委却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可改编。

这样，大家就更不相信陈毅同志是代表党，而怀疑他是叛徒。

陈毅同志说：“你们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对我的怀疑和所提的问题，都是可以理解的。你们的这种革命警觉性，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也是对的。但是，你们不能只凭一时的怀疑去做结论。”

大家坚持要陈毅同志交代叛党的经过。因为不久以前报纸上登过“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的消息。他们还要陈毅同志把他这次“勾结”敌人进攻湘赣边的经过讲出来，以得到宽大处理。

陈毅同志反问他们：“反动派的报纸你们也相信吗？！”

段焕竞和刘培善同志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了陈毅同志提出整训改编的问题，认为事关重大，遂决定把陈毅同志送到省委，请谭余保同志亲自处理。

他们把陈毅同志从九龙山送到甘子山临时省委住的棚子里。不久，陈毅同志就被捆了起来，吊在竹棚子的这一边，而竹棚子的那一边，省委正在研究怎样处理他。彼此只隔一道竹墙，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见。陈毅同志听到棚子那边省委决定要杀他时，他在棚子这边就喊：“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棚子四周坐满了人，就象要公审犯人一样。

谭余保同志从竹棚一边走出来时，大家对他肃然起敬。

陈毅同志见他身佩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根竹根做的长烟管，就开口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同志吗？”

“谁是你的同志？我知道你早叛变了！”谭余保同志答。

“我是代表党来的。”

“你代表哪个党？代表国民党？”

“我是陈毅。”

“我早晓得你的名字。嘿，你在井冈山那个时候，集合队伍讲话，我拖个梭标来听你讲，从猴子讲到人，从天上讲到地下，从井冈山讲到全世界，一讲几个钟头，讲得头头是道。你过去讲的话，你自己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啊！”

“讲革命。就是要革命，不要投机嘛！可你现在怎么样！你要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就要杀头！”

“你抗不抗日？”陈毅同志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同志答。

“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同志感到高兴的是，他和谭余保同志之间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抗日”。

谭余保同志接着说：“不过，要我抗日，得有个条件：恢复井冈山八县的根据地。”

陈毅同志说：“你们何见之浅也。同志哥啊，你就只看到那八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要争取领导权，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不只井冈山那八个县。”

“这个还讲得有理。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很奇怪。只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只有‘苏维埃救中国’，怎么可以取消苏维埃？”谭余保同志进一步提出问题。

“过去提的‘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的矛盾下降了，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因此，我们已用‘抗日救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我们要实行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毅同志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你就是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这就

是要灭亡中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却要把军队拉出给蒋介石改编。”谭余保同志忍不住抽出烟管，要打陈毅同志的脑壳：“你是个叛徒。”

“改编红军，取得给养，红军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对我们更有利。革命的阶段不同了，就要有新的策略来适应新的形势。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陈毅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党的主张。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起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这三年，你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同志显得有些生气了。

陈毅同志声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他先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并说：“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看一看。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同志的情绪相当激动，一时竟说漏了嘴。

陈毅同志抓住这个机会，以高屋建筑之势，侃侃而谈：“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我非常佩服。骂我叛徒，我也不见怪。你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难突然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讲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也要抓起来。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接着，陈毅同志面向大家，郑重地说：“你们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能干！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枪毙吧！”

“好家伙，这个叛徒还满硬呐！”谭余保同志说罢哈哈大笑。接着，他命令马上把陈毅同志押走：“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理论。”

在这之后，谭余保同志又和陈毅同志谈过几次话，逐渐感到对陈毅同志的怀疑未必妥当。为了搞清事实真相，他决定派出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等地了解情况。

交通员带着陈毅同志的亲笔信到吉安找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向他讲解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明确表示陈毅同志是代表党上山联络的。交通员一听，立即背起半麻袋的《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等文件，连夜回山。

谭余保同志听了交通员的汇报，看了党中央的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同志松绑，抱歉地说：“你来这里四天四夜了，真对不起。”随后，他拉着陈毅同志的手，热泪纵横，亲切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亲人了。自从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出发长征以后，彭辉明同志牺牲了，陈洪时又叛变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持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陈毅同志坦然地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我脾气不好，请你不要见怪。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

谭余保这个农民领袖，感情很纯真。他和陈毅同志促膝谈心，讲他们怎么起义，怎么上山，怎么隐蔽，怎么发展，一讲就讲到天亮。

第二天，湘赣临时省委开会，请陈毅同志作指示。陈毅同志说：“你们下山后要抓住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要是抗日爱国的就欢迎。”临时省委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

不久，湘赣边游击健儿，告别了掩埋着战友的坟墓，走出了掩护他们坚持斗争的武功山、九龙山、武里山、牛心山、甘子山、杨梅山等深山密林，奔向指定的集中地点——莲花县的龙上村。

后来，谭余保同志曾对我说：“陈毅同志那次到湘赣边来，我们那样对待他，他从不计较。”陈毅同志对谭余保同志的感情也很深厚，他也曾对我说：“谭余保这个人本质很好，我对他是很尊敬的。他是一个很好的游击战争领导者。‘七大’时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还向我提起在湘赣边的那次误会，说对不起我。我说没什么，都是为了党嘛！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你们怀疑我也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风格，何等宽广的胸怀！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当受到委屈时，是悻悻然，斤斤计较，不可终日呢？还是坦荡荡，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团结起来向前看呢？这的确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二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国民党接受了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和河南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要求，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军部开始设在南昌，后来转移到皖南。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

- 第一支队司令员 陈 毅
- 副司令员 傅秋涛
- 第二支队司令员 张鼎丞
- 副司令员 粟 裕
- 第三支队司令员 张云逸（兼）
- 副司令员 谭震林
- 第四支队司令员 高敬亭

新四军的成立，标志着南方各游击队的斗争，由游击战争转入抗日救国的新阶段。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局为此发表了《告南

方各游击队的公开信》。

南方八省的各红军游击队热烈响应中央分局的号召，纷纷开赴指定地点集合，编入了新四军。除了我们赣粤边游击区外，尚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同志领导的闽西游击区；黄道、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和闽东游击区；粟裕、刘英等同志领导的浙南游击区；赖昌祚、钟德胜、胡荣佳、彭胜标、张开荆等同志领导的闽赣边游击区；谭余保、曾开福、段焕竞、刘培善同志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涂正坤、钟期光、江渭清、谭启龙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赣边游击区；关英、李步新、王丰庆、刘毓标等同志领导的赣东北游击区；以及闽南游击区、湘南边游击区、鄂豫皖边游击区、桐柏山游击区和琼崖游击区（根据国共谈判协议，琼崖区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改编为琼崖抗日独立队）。

随后，新四军在南昌成立办事处，由黄道同志负责。并在吉安、贵溪、瑞金、平江、修水、婺源、都昌、袁州、赣州、大余以及池江等地，相继成立新四军留守处或通讯处，留下了一些领导干部和武装，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保持前后方联络，抚慰革命烈属、军属及保卫群众既得利益。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万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在千千万万的群众送别声中，高唱着战歌，开赴抗日前线。当我们离开战斗了一千个日日夜夜的赣粤边时，我伫立在章水之滨，回首仰望那经过战火洗礼的油山，青松挺立，朝霞似锦，更显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新四军到达抗日前线以后，党中央书记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从桂林经衡阳、南昌，辗转到了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住了二十天，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后 记

这本小册子最后修改定稿了。当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重温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这段历史，发扬当年的优良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精神，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也是推动我整理这本小册子的缘由。然而，我当时年纪很轻，亲身的经历毕竟有限，我所了解的情况也只是局部的。而且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的许多印象，如今有的已模糊不清。因此，今天要把当年广大人民群众和游击战士的无限丰富生动的斗争故事，以及他们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比较全面周详地写出来，对我来说是难于胜任的。好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生前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都作过好几次重要的讲话；中共江西省委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对三年游击战争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当年的战友们也写了不少的回忆文章。所有这些，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对整理这本小册子也是很有帮助的。谭震林同志又专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言。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表示深切谢忱，并由衷地欢迎当年的战友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陈 丕 显

一九八一年八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春改定